

教育要情参阅

2018 年第 4 期（总第 36 期）

西安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办

编排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

关键词：“双一流” 金课

目 录

陈宝生：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	1
吴岩：建设中国“金课”	9
陕西省高校“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战略和对策研究.....	17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的反思与重构.....	22
治理“水课”打造“金课”	30
关于“双一流”建设若干关系的思考.....	34
国际视域下的“双一流”建设及其中国特色体现.....	41
“双一流”高校要重视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基于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管理模式的分析.....	47
“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55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本为本”，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放在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放在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

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

教育部 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中多次就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作出重要论述，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就教育重大议题进行审议，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多次给学生回信，对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系统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推进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考察，出席师生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党的十九大之后总书记首次专门系统讲高等教育。总书记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高度，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揭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全面部署了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四个“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最大关切，对高等教育的热切期望，对扎根中国大地办高等教育、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总书记指出，高等教育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确立“两个重要标准”就是要将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标准；提出抓好“三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对青年学生明确提出“四点希望”，鼓励广大青年要爱国、励志、求真、力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总书记还重申了“四有”教师的要求，即：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2 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新的部署，思想更加升华、理论更加深刻、标准更加具体、体系更加成熟。既有宏观阐述，又有中观要求；既有思想政治规范，又有全面业务要求；既有思想理念，又有标准方法，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

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5·2 讲话”精神，6 月 21 日，教育部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第一次召开的以本科教育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把握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关键，提出了“振兴本科”的时代命题，明确了新时代本科教育的基本方针、发展路径和重要举措。

一、坚持“以本为本”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中具有战略地位的教育，是纲举目张的教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本为本”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放在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放在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

“以本为本”是由本科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的。本科教育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是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的成型期，要教育引导學生铸就理想信念、锤炼高尚品格，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打牢成长发展的基础。这一阶段也是学生知识架构、基础能力的形成期，要教育引导學生夯实知识基础，了解学科前沿，接触社会实际，接受专业训练，练就独立工作能力，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为学生成才立业奠定坚实基础。“以本为本”是由本科教育的地位作用决定的。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体量规模最大，本科生是高素质专门人才培养的最大群体。本科生培养质量直接影响到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据统计全国 1200 多所本科院校在校生中，本科生与研究生比例是 8:1，毕业生中本科生占比 8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了 6000 多万本科毕业生，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本科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基础。没有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研究生教育就没有支撑，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培养了 650 万左右研究生，他们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没有本科教育的优质生源作为基础保障，做到这一点是不可想象的。

近千年的世界大学发展史表明，本科教育始终是高等教育的立命之本、发展之本。一流大学普遍将本科教育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本科教育被这些

大学视为保持卓越的看家本领和成就核心竞争力的制胜法宝。进入 21 世纪，人才培养的本质职能进一步强化和凸显，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大学纷纷回归本科教育，启动本科教学改革。“回归本科教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行动纲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我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举办着当今世界上规模最高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以千万计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近年来，各地各高校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专业建设成效显著，教育部发布了首个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标准，各高校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着力提升专业内涵和质量。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国际实质等效，其他专业认证工作全面有序展开。课程改革亮点频出，推出了一大批线上线下精品课程，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学科思政体系正在形成。教学改革深入推进，慕课建设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走在了世界前列，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星火燎原之势。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逐步完善，高校开展了一轮审核评估，完成 200 余所新建本科院校合格评估，质量文化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总的看，本科教育工作全面企稳向好。2018 年高校师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显示，大学生对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满意度较去年有大幅提升，其中对教师教学水平、育人意识和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的满意度提高了 8~10 个百分点。这些成绩有力证明，只有坚持“以本为本”，才能实现人才培养工作的大繁荣大发展。

目前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已进入提高质量的升级期、变轨超车的机遇期、改革创新的攻坚期。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本科教育仍然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理念相对滞后，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些高校仍然因循守旧，知识体系、教育模式、育人机制、管理制度等缺乏创新，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技术手段明显滞后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需求，有被时代甩下的危险。投入不很到位，不少高校在本科教育上存在着领导精力投入不到位、教师精力投入不到位、学生精力投入不到位、资源投入不到位问题，本科教育仍处在艰难爬坡中。评价标准和政策机制导向不尽合理，有的高校评价指标没有充分体现立德树人的成效，人财物方面的政策机制还没有聚焦到人才培养上来。比如，片面追求论文、专利、项目等数量指标，弱化了人才培养。提升本科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完成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从理念、制度、政策等各个层面进行改革创新。

二、把“四个回归”作为加快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基本要求

2016 年教育部党组提出，高等教育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四个回归”的核心是回归大学的本质职能，把培养人作为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回归常识，就是学生要刻苦读书学习。学生的第一任务就是读书学习。高校必须围绕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激励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要引导学生读“国情”书、“基层”书、“群众”书，读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马列经典、中外传世经典和专业经典，让学生更好地认识世界、了解国情民情，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学会理性思考。引导学生读专业书，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面向实际、深入实践，以知促行、以行求知，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高校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办教育，以学生的学习结果为中心评价教育，以学生学到了什么、学会了什么评判教育的成效。回归常识，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成为有理想、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更好地为国为民服务。

回归本分，就是教师要潜心教书育人。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教授就得教书授课，离开了教书授课就不是教授。必须明确，高校教师不管名气多大、荣誉多高，老师是第一身份，教书是第一工作，上课是第一责任。要引导教师热爱教学、倾心教学、研究教学。要让高校教师做到“德高”，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做到“学高”，下苦功夫、求真学问，以扎实学识支撑高水平教学；做到“艺高”，提升教学艺术，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改造学习、改造课堂的能力。回归本分，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提出的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的要求，让教师潜心教书育人，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回归初心，就是高等学校要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高等学校的初心就是培养人才，也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要用知识体系教、用价值体系育、用创新体系做。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鲜亮底色”，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续打好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构建全程全员全方位“三全育人”大格局。要促进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专业素养和过硬本领，全面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回归初心，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学生提出的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希望和要求，培养又红又专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回归梦想，就是高等教育要倾力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梦。教育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推动高校办学理念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努力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回归梦想，就是要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对高等教育的殷切期盼，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输送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有力支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个回归”是高等教育根本使命的强基固本，是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同频共振，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奋进之笔。把“四个回归”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关键是要做到“九个首先”。各高校领导的注意力首先要在本科聚焦，要下功夫配备重视本科教育的班子，校长要争当“本科校长”；教师的精力要首先在本科集中，要打造能够担当本科教育重任，能够支撑起本科教育大厦的教师队伍，培养热爱本科教育的教师；学校的资源要首先在本科配置，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都要首先满足本科的需要，把本科作为资源配置的第一序列；教学条件和教学工具，无论新旧、软硬，首先要在本科使用，满足本科教学需要；教学方法和激励机制要首先在本科创新，全面带动综合改革；核心竞争力和教学质量要首先在本科显现，评价标准要衡量本科教育的成效；发展战略和办学理念要首先在本科实践，本科是校长办学理念的实践主体，是学校发展战略的实践主体；核心价值体系要首先在本科确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核心价值体系，首先要在本科确立；依法依规治校要首先在本科推进，要树立用法治方法抓治理的理念，重要问题、热点难点问题上要学会用法治方法去解决。这“九个首先”是对本科教育的要求，是落实“以本为本”的核心。

三、抓紧完善加快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政策措施

加快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既是一个战略工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精心谋划、有序推进、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新时代高教40条”），对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作出系统设计和总体安排，确立建设一流本科、做强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的施工方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好“新时代高教40条”的落实，不断推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带动形成全局性改革成果。

（一）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要围绕“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这一主题，广泛深入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起推动本科教育蓬勃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梳理排查影响本科教育改革发展、影响“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的主要问题，重点围绕本科教育存在的领导精力投入不到位、教师精力投入不到位、学生精力投入不到位、资源投入不到位的问题，围绕理念滞后、方法陈旧、管理不严、“水课”过多、毕业论文（设计）质量不高、评价标准和政策机制聚焦不足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题学习研讨、进行专项研究部署，增强改的意识、统一改的思想、凝聚改的共识、拿出改的决心。要根据本地、本校实际，动员全体干部教师参与，组织多种形式的学习研讨，进一步明确干部教师的教书育人使命，提高认识、更新观

念，增强齐心协力办好本科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明确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振兴本科教育的思路举措。主要负责同志要以上率下，带头学习，在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体发表学习心得、解读文章。要在校报、校刊、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各类媒体上开辟专栏，组织干部教师发表体会文章，介绍典型经验，宣传改革成果，努力营造振兴本科教育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规范教育教学秩序。高校要认真梳理学校课堂教学的各项规章制度，及时修订完善课堂教学建设和管理相关规定。要认真查找课堂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切实抓好整改，明确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和时间要求，真正把课堂教学建设强起来、课堂教学质量提起来。要加强学习过程管理，各高校要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切实规范学生管理。要及时研究修订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从 2018 级本科生起，抓好实施工作，持续抓四年，全程管到位。要加强对在校生的分类指导和严格管理，切实加强学习过程考核，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严格考试纪律、严把毕业出口关，坚决取消“清考”制度。要切实加强对毕业论文（设计）的管理，切实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的通知》要求，修订完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强化指导教师责任，加强对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要严格实行论文查重和抽检制度，建立健全盲审制度，严肃处理抄袭、伪造、篡改、代写、买卖毕业论文等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和问题，确保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三）抓好关键环节建设。要把学科专业建设作为基础，适应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建设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保障有力的一流专业。重点建设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和领域，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各地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地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统筹管理，加强对新设专业评估检查，加大对专业办学条件的公开力度。各高校要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不断提高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契合度，发布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报告，推动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有效联动。要把课程建设作为核心，建设综合性、问题导向、学科交叉的新型课程群，将学科研究新进展、实践发展新经验、社会需求新变化及时纳入教材，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淘汰“水课”、打造“金课”。要把课堂建设作为重要抓手，改革传统的教与学形态，广泛开展探究式、个性化、参与式教学，推广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着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要强化协同育人。建立与社会用人单位合作更加紧密的人才培养机制，健全培养目标协同机制，与相关部门联合制订人才培养标准，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实践育人平台建设，综合运用校内外资源，建设满足实践教学需要的实验实习实训平

合。推动管理协同，与相关部门、高校搭建对接平台，对人才培养进行协同管理，培养真正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强化科教协同，结合国家重点、重大科技计划任务，将最新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搭建学生科学实践和创新创业平台，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深化国际合作育人，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开展联合培养，培养具有宽广国际视野的新时代人才。

（四）加快构建长效机制。要完善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机制。大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在教学和管理中的应用，重塑教育教学形态，打造智慧学习环境，探索实施智能化的精准教育，以现代信息技术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实现“变轨超车”。有序有效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建设、应用及管理，制定慕课标准体系，规划建设一批高质量慕课，示范带动课程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建立完善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制度，推动学分互认。要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升级版，服务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统筹谋划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双一流”建设、“部省合建”、省部共建、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等工作，形成合力，务求实效。以成都、西安、兰州和重庆、成都、西安这两个西三角为战略支点，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导向，以区域内高水平大学为发展龙头，引领带动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形成“集聚一溢出效应”。引导和支持中西部高校增强“自我造血”功能，练好内功，激发内在动力、发挥区域优势、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提高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健全质量评价与保障机制。按照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标准及有关行业标准，确立人才培养要求，完善自我评估制度。强化每个主体的质量意识、质量责任，逐步形成以教育部门为主导，学校为主体，行业部门、学术组织和社会机构共同参与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质量保障制度体系。要营造浓厚的教育质量文化。推动高校建立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突出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将质量标准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将质量要求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形成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核心的质量文化。

（五）注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全面总结 2009 年以来开展的系列卓越拔尖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工作成效的基础上，启动实施卓越工程师、医生、农林人才、法治人才、新闻传播人才、教师等系列教育培养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2.0。这是呼应时代需求、响应战线期待、顺应发展大势的重大改革，是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的重要抓手，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的领跑计划。“六卓越一拔尖 2.0”，以提高育人质量为核心，将通过强化部、省、

校三级实施体系，推动领导精力、教师精力、学生精力、资源投入更加聚焦人才培养工作。“六卓越一拔尖 2.0”涉及专业结构调整、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质量保障制度和质量文化建设等各方面改革，通过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即建设 1 万个国家级一流专业点和 1 万个省级一流专业点，建设 1 万门国家级和 1 万门省级线上线下精品课程，以典型示范带动各类高校提高办学水平。要努力建设一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杆大学。按照政治标杆、办学标杆、育人标杆、队伍标杆的标准，发挥好排头兵、领头雁的作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要激励和引导“双一流”建设高校争当立德树人的标杆，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走在前列、干出成效、做好示范。

（六）强化要素保障。一流的本科教育，需要配置一流的人财物要素来保障来支撑。教育“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 4%”，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的重视和关心。各地要健全教育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牢固树立“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的理念，把教育作为战略性投入予以优先保障和重点投入。调整优化高等教育投入分配结构，更加注重对“人”的投入，更加注重“软件”投入。通过真金白银大量投入、“硬件”“软件”一起改造，让资源配置更加聚焦本科人才培养工作。引导各地统筹地方财政高等教育资金和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支持地方高校推进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指导和督促各高校适应新形势下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利用好各项财政资金，充分汇聚和利用校外资源，支持和加强本科人才培养工作。

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本科教育的能力和水平，要把一流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推动一流本科教育的根本大计，将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向教师发展聚焦，向教学聚焦，切实巩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要加大对教学业绩突出教师的奖励力度，把教学质量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把教学水平作为教师的一种专业能力，发挥好教研室和集体备课等这些高校教学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设立教学带头人岗位，加强对青年教师特别是新入职教师的“传帮带”，提升每一位教师的教学能力。要制定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专门管理规定，确保教授全员给本科生上课。评价是指挥棒，让教师安心教学，必须在考核评价方面增加教学的权重。对教师教学评价的要求要硬一点，教学工作达不到平均水平，就不能晋升职称，真正将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到实处。坚持以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健全师德考核制度，严格执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推动师德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要在实践中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树立新理念、制定新标准、构建新机制、采用新技术、提供新保障、倡导新文化，不断探索创新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

来源：党委中心组学习·中心组讲堂，2018年第5期

本文为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2018年11月24日在第11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的报告整理。

吴岩：建设中国“金课”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

2018年6月21日，教育部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新时代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5个月的时间里，一流本科教育一直是高等教育界乃至社会上热议的话题。几乎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超过1000所本科院校，不仅心动，而且在行动。我们所看到的并不仅是理念，而是行动方案、行动计划、建设措施。正如陈宝生部长所说的，我们把高等教育的这池平静的水，搅动起来了！从那时开始，我们不断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消灭“水课”、建设“金课”。“水课”和“金课”已经成为热词，“消灭水课、打造金课”得到了高等学校乃至社会上一边倒的叫好。那么，什么是“金课”？什么是中国大学的“金课”？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建设中国大学的“金课”？今天就向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想法。

在去年的第十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我作了一个报告，主要是讲一流专业的问题。为什么要讲一流专业？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金课”，也就是一流课程。我们还有个基本判断，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学生从大学里受益的最直接、最核心、最显效的是课程。

最近发生了几件对中国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对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第一件大事是2018年9月10日召开了全国教育大会，由中央组织召开全国教育大会，这是第一次。第二件大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了2小时40分钟的长篇重要讲话，正如陈宝生部长所说，全国教育大会是一次可以写入历史、可以改变人类生活、可以开启新时代的大会，是一次可以让我们满

怀期望的大会、具有里程碑历史意义的大会。第三件大事是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俗称“新时代高教40条”。教育部会同14个中央部委和单位联合推出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第四件大事是“双一流”建设有了新要求。前不久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强化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明确“双一流”建设的核心是人才培养，同时明确了一流本科教育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基础地位。陈宝生部长在各个场合反复强调，没有一流本科，“双一流”建设就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们对“双一流”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的主题是全面振兴中国本科教育。要形成压倒性态势，让这件事情在高等学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用三年的行动计划使这件事情真正走入人心，走入大学的每一个角落，使一流本科教育、一流人才培养成为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

为什么要如此看重课程？我们有四个基本判断：第一，课程是教育最微观、最普通的问题，但它要解决的却是教育中最根本的问题——培养人。如果不培养人，教育就不配叫作教育，学校就不配叫作学校，大学就不配叫作大学。所以，课程虽然属微观问题，却是个根本问题，是关乎宏观的战略大问题。第二，课程是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短板、瓶颈、软肋，是一个关键问题，不仅是新建本科院校、地方本科院校，包括“985工程”“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高校，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差别只是问题的轻重、问题的呈现方式不同而已。第三，课程是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理念的“最后一公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是世界高等教育共同的理念，课程是解决这个理念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前面所说的所有的事情都做不好。第四，习近平总书记说评价学校好与坏的根本标准是立德树人的成效，而课程正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化、操作化和目标化。所以，建设中国大学“金课”，我们将会发狠力、会精准发力，使大学里的“水课”越来越少，直至消失；使“金课”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享受“金课”。

今天报告的主题是“建设中国金课”，重点讲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金课”，二是打造五大“金课”，三是建设“金课”的五大保障。

一、什么是“金课”

2018年6月21日，陈宝生部长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对大学生要有效“增负”，要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真正把“水课”转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随即在8月份，教育部专门印发了《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教高函〔2018〕8号），

提出“各高校要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这是教育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金课”这个概念。整顿高等学校的教学秩序，“淘汰水课、打造金课”首次正式写入教育部的文件。

什么是“水课”？“水课”就是低阶性、陈旧性的课，是教师不用心上的课。低阶性就是学生不用抬腿就可以通过，课程中没有学生能力的训练，也没有学生素养的养成。至于陈旧性，我先举个例子。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Basic 语言”是给研究生开的课，我们在学校操作 286 的时候要穿白大褂、换拖鞋才能进机房。“Basic 语言”在那个时候是时髦的课，是先进的课。过几年，这门课研究生用不上了，改给本科生上。又过了几年，本科生也用不上了，再改给夜大的学生上。再过几年，给社区教育的老大妈老大爷上。“Basic 语言”这门课放在今天，就是陈旧、过时的课。不用心的课，说严重点儿就是没良心的课。学生可以不走心，听听就可以通过，这种课我们不仅要淘汰，还要让它成为过街老鼠，成为老师羞于拿出来的课，成为学生抵制的课。

什么是“金课”？可以归结为“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其一，高阶性，就是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课程教学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是知识、能力、素质的结合，且不只是简单的知识、能力、素质的结合。对本科生毕业认证的一个关键要求，就是毕业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没有标准答案，更多的是能力和思维的训练。其二，创新性。创新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课程内容有前沿性和时代性；二是教学形式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不是满堂灌，不是我讲你听；三是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不是简单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是培养学生去探究，能够把学生的个性特点发挥出来。挑战度是指课程一定要有一定难度，需要学生和老师一起，跳一跳才能够得着，老师要认真花时间花精力花情感备课讲课，学生课上课下要有较多的学习时间和思考做保障。

二、打造五大“金课”

在今后两年到三年时间内，我们要下大力气建设五大类型“金课”，包括线下“金课”、线上“金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虚拟仿真“金课”和社会实践“金课”。

经国务院批准，谢和平教授和杨宗凯教授分别领衔的两个项目将被授予 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这两项教学成果都与课程有关。谢和平教授牵头的“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的一流本科教育川大实践”，主要是课堂上的课，属线下的课；杨宗凯教授牵头的“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重构与探索实践”，主要是线上线下混合式的课，即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的课。这些都是我心目中的爱学生、懂教学、有教育情怀的教师开设的中国一流“金课”。

1. 线下“金课”

课堂教学是“金课”的主阵地、主渠道、主战场。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课堂革命。什么是课堂革命？我原来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当主任，到过几百所学校去评估，听过几千位老师讲的几千门课。我们请了国际上最著名大学包括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与它们的校长、专家座谈，也与加拿大、英国的专家一起讨论一流大学、一流本科、一流课程，总结出大学课堂教学的五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叫 silence，课堂上很安静，老师拼命讲，学生拼命睡、拼命吃、拼命玩，互不干扰，一片祥和，就是没有拼命跟老师学习。第二重境界叫 answer，老师提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让学生回答：对不对？好不好？是不是？Yes or no？这种互动跟没有互动差不多。第三重境界叫 dialogue，有情感和内容的交流，这种课是好课。第四重境界叫 critical，有批评质疑的味道在其中，学生不仅和老师有互动，还能针对老师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可能跟老师还有点小争论。最高一重境界是 debate，有争论、争辩，甚至还有争吵，老师讲的学生可以不同意，学生可以讲自己的看法。UCLA 的校长对我说，如果把资质相同的学生一分为二，一部分在 silence 的课堂上，一部分在 critical 或者 debate 的课堂上，四年过去后，前一部分可能是被动的只会循规蹈矩的只掌握已有知识的人，后一部分则会成为独立思考、敢于批评、敢于质疑，有创新能力、创新思维的社会需要的时代新人。

我今年先后四次到四川大学调研，让我惊喜的是，四川大学的很多课就是 dialogue、critical、debate，这不是表演出来的，几百上千门课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决定在四川大学召开全国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让全国高校的校长、书记，让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管理部门的主任、厅长们一起观摩他们的课堂教学。

“川大模式”当之无愧获得全国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领域中的最高奖——教学成果特等奖。所以说，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做不做，我们舍不得不舍得花时间、花精力、花情感、花钱，并用我们的爱去建设这样的课。如果有决心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建成世界一流的“金课”。这就是我的亲身体会。

2. 线上“金课”

“互联网+教育”催生的一种新课——慕课（MOOC），是有生命力、有前途、有未来的课，是有可能通过网络改变教育的课。所以我们 2017 年推出了首批 490 门课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这 490 门课就是我们国家级高水平的线上“金课”。现在正在进行第二批评审，今年将推出 800 门“金课”。我们一共要推出 3000 门国家级线上“金课”。大力推动在线开放课程建、用、学，是实现中国高等教

育质量特别是人才培养质量“变轨超车”的关键一招。变轨超车不是弯道超车，是另辟蹊径实现超车。目前我国上线慕课数量达到 8000 余门，高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选用人数突破 1.4 亿人次，获得慕课学分的大学生已经超过了 4300 万人次，可供西部高校选用的慕课超过 65000 门次。我国不仅在建设学习型社会，还在建设学习型国家。为此，我们专门开设了一百门线上“金课”供军队的现役军官和士兵学习；中宣部供全国党政干部学习的“学习强国”平台专门设立“学习慕课”专栏，也从大学慕课中精选了 170 余门课程。在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国家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学慕课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现在可以不谦虚地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慕课大国，正在用中国方案参与并主导国际慕课标准的制订。

3. 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线上的课线下的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模糊了分界的混合课。比方说翻转课堂就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有效策略和方式，它颠覆了传统课堂教学中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和教学方式的革命。我们要大力推广这种线上线下混合式的“金课”，每个学校都可以建、可以用、可以学，充分应用线上“金课”进行本地化改造，探索线上“金课”的多种应用模式，打造适合本校学生特点和培养需要的“金课”。我们注意到很多民办院校也开始建这样的课。民办院校要用传统的方式与百年老校去比拼，很可能多年以后仍然落在后边，而用这样的方式，未必不能实现“变轨超车”。所以这是关键的一招，是超前的一招，还是“变轨超车”的一招。如果我们的老师能够打造越来越多的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的“金课”，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会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我看过计算机专业教指委建的课程，有边讲边练的，有学生讲学生评的，有学生练代替讲的，有学生问学生答的，有案例点评的，还有特殊无障碍教育的 MOOC。我的感觉是，现在的“90 后”“00 后”，当老师还在用传统方式授课时，学生虽人在课堂，但心已经离开了，眼睛是无光的；而换作混合式“金课”，包括“三本”的学生和以往大家认为学习水平不高的学生，在课堂上都是生龙活虎的，他们参与的热情超过想象。现在很多学校不让学生用手机，但在课堂上，手机也可以用来和老师互动。管、堵不如疏、导。这些课使我们感觉到确实要有课程革命，确实要有教与学的革命。

4. 虚拟仿真“金课”

我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采访时说过，虚拟仿真实验实训的课有可能是一种新的教育生产力。虚拟仿真，我们看中的是“互联网+教育”之后的“智能+教育”。我很赞赏和支持杨宗凯教授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探索“智能+教育”。如果说“互联网+教育”的课深刻地影响了今天，那么“智能+教育”有可能开启

教育的未来。我们一方面在做“互联网+教育”，另一方面要紧紧跟踪、探索创新“智能+教育”。未来“互联网+教育”“智能+教育”，将有可能成为新的教育形态。对此，大家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兴趣和敏锐，要敢于先吃螃蟹，中国的教育有可能为世界提供真正的中国方案。

为什么要建虚拟仿真“金课”？因为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破解了高等学校实验、实习、实训中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了原先“做不到”“做不好”“做不了”“做不上”的问题。我到中国石油大学调研，注意到“井喷”教学就用了虚拟仿真的手段。教师教学不可能让油田发生真正井喷，也不可能让原子弹发生真正爆炸，更不可能让学生坐火箭上天坐潜艇入海，但是虚拟仿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上海交大提供了医学教育虚拟仿真的课程，医学生没有拿到执业资格证书之前是不允许做手术的，但心脏的手术可以在虚拟仿真的课程中随意做，而且真实感非常强。这些已经突破了原先的实习实训必须到工厂真刀实枪做的局限，事实上很多工厂也不允许学生真的开机器操作。我们推出的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到今年年底，一共评出 300 多门。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就是我们说的国家级“金课”。

5. 社会实践“金课”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大赛推出了两堂课——两堂中国最大的课。一堂课叫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是有温度的国情思政大课。目前已有 70 余万人同上这门课，14 万支团队走进中国边远的山村，走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上了一堂生动的国情课，传承红色基因，接受思想洗礼，了解国情民情，助力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大学生热情高涨，似星火燎原。这种课不仅入眼入耳，还入脑入心，成为滴灌式的课，被孙春兰副总理誉为解决中国大学生国情教育的关键一招、创新一招。另一堂课是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年有 265 万人同上这门课，产生 64 万个项目，成为全球最大最好的双创路演平台，被国内外媒体誉为“无与伦比、惊艳非凡、继往开来”的盛会。我们也称之为中国最大的有激情的创新创业课。这两门课都属于我们所说的“金课”。

今年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以“勇立时代潮头敢闯会创扎根中国大地书写人生华章”为主题，有广度、有深度、有高度、有温度，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对接“一带一路”、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孙春兰副总理出席大赛闭幕式并讲话。她还表示：“以后我要年年来参加这个大赛。你们这个课让我感到很受教育，很震撼。”我们办了一次惊艳非凡的大赛，推出了两堂大课，一个解决的是接班人的问题，就是思政的问题，另一个解决的是建设者的问题，就是创新创业的问题。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写了回信，今年又专门请中央办公厅对参加大赛、参加红色之旅的大学

生给予亲切的问候。中国“互联网+”大学创新创业大赛，已经成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载体，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推动产学研用结合的关键纽带。我们还在探索，创新创业大赛要与德育相结合，打造德育大平台。要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打造智育大平台。还要把敢闯会创、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与追求更高更快的体育精神相结合，打造体育大平台。我们的美育，除了风花雪月之美、小情小调之美，还要有欣赏诗书文化之美，更要有人生创造的大美壮美，比如大学生该有的狼性和血性、家国情怀和团队精神，创新创业的大赛要把小美和大美结合起来，打造美育大平台，美美与共。创新创业还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是一种高级的劳动形式，要和劳育相结合，打造劳动教育大平台。总之，社会实践的“金课”要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有惊艳非凡的体验，有海阔天空的未来。

三、建设“金课”的五大保障

建设中国“金课”，没有旁观者，都是建设者。要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为建设中国“金课”提供五大保障。

1. 政策保障

教育部今年连续出台加强本科教育的系列政策，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干货满满，措施多多，并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14个部委联合出台的卓越工程师、卓越医生、卓越法治、卓越新闻、卓越农林、卓越教师和基础学科拔尖2.0版的计划。这是我们领跑的一流专业的建设计划。

2. 组织保障

11月1日，新时代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这个规模最大、覆盖最全、水平最高的由5500多专家组成的中国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包含111个教指委和40个分教指委，覆盖了本科教育的92个专业类和630个专业，将成为一流本科建设的参谋部、咨询团、指导组、推动队。我们要发挥教指委的作用，抓好淘汰“水课”、建设“金课”的工作。

3. 机制保障

今年8月24日，中办和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我们要率先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中打造“金课”，把“金课”建设作为“四新”建设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好，抓出成效。这四个“新”是关于理工农医教文等方面全面发力的四个带头引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探索。从世界范围看，我们也跑在最前面。

实施一流课程的“双万”计划。建设1万门国家级一流线上线下的精品课程，也就是我们说的国家“金课”；打造1万门省部级一流线上线下的精品课程，我们叫地方高校的“金课”。这两个1万门就是要淘汰“水课”、打造“金课”，使“金课”落地生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级的“金课”中要有相当比例的地方高校的“金课”，包括新建本科院校的课程，还要有非常好的民办高校的课程。“金课”不是只为部属院校而设的，中国高等学校所有的好课都可以选作国家级“金课”。

推进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到2020年推出1000个左右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以提高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的效率和效果为重点，打造虚拟仿真的“金课”。

继续办好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鼓励老师和学生积极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锤炼大学生意志品质，使大学生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办成高等教育领域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赛事，培养学生敢闯会创、爱拼会赢的意志品质和身心素质，提供让大学生展现自我、绽放青春的人生大舞台。明年还计划邀请一百个国家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名称将增加“国际”两个字，成为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赛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创新创业的路演平台，成为中国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一张靓丽名片。

4. 评价保障

教育部提出推进开展“保合格、上水平、追卓越”的三级专业认证。在三级专业认证中，我们要把“金课”建设作为一个核心要素，把“金课”建设要求落实到具体观测点上，形成可量化、可检测、可评价的“硬杠杠”和“硬指标”，把“金课”作为一流专业建设的基本要素。没有“金课”、好课，就不能成为国家的一流专业。

5. 经费保障

口号要变成目标，变成行动，变成措施，要取得效果，要落实体现在“金课”的建设上，要有实招硬招，要舍得真金白银的投入。一流的课要有一流的投入，包括一流的时间、一流的精力、一流的情感，否则就建不成“金课”。这就需要老师们有情怀、有格局、有担当。我们的政策也要跟上去。教育部现在正在进行各级各类教育评价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工作，要让政策机制跟上去，形成配套。教育部和各省市区地方政府将通过多种途径，把中央教改项目教育专项资金向建“金课”方面倾斜，加大对建设国家和地方“金课”的支持力度，使改革真正惠及学生，真正在人才培养质量上得到体现。

展望未来，如果我们建设了两万门中国“金课”，在 92 个专业大类、630 个专业都有“金课”，既有公共课“金课”，也有专业课“金课”，有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金课”，有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金课”，还有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金课”，使“金课”异彩纷呈、多种多样，我们就可以说拿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杀手锏，打造实现学生更好发展的金钥匙，从而让三个“一去不复返”变成现实。三个“一去不复返”指的是：一部分学生天天打游戏、天天睡大觉、天天谈恋爱，“醉生梦死”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一部分教师“认认真真培养自己、稀里马虎培养学生”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一部分学校“领导精力投入不足、教师精力投入不足、学生精力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足”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愿景怎么才能变成现实？就是要建设更多的“金课”，淘汰直至消灭“水课”。大学的天职是什么？教书育人！大学的良心是什么？潜心教书育人！如果说建设教育强国是个梦的话，我们把天职做好，把良心活干好，就会梦想成真，就会变成现实。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中国的高等教育强国梦早日梦想成真！

来源：搜狐教育网，2018 年 12 月 06 日

陕西省高校“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战略和对策研究

摘要：在国家努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下，本文针对陕西省高校“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战略和对策，对陕西省 8 所“211 工程”和“985 工程”高校的类型、特点及其各自与“双一流”建设目标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明确了陕西省不同类型高校“双一流”建设的主要目标，提出了陕西省高校进行“双一流”建设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陕西省高校的“双一流参考的决策建议。

关键词：一流大学；一流学科；陕西省高校；211 工程

一、“双一流”战略的提出背景与研究现状

2015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和“进入一流前列”的总体目标以及“三步走”战略，

吹响了中国大学冲刺国际前沿的“冲锋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和各高校纷纷出台立足本地区实际的“双一流”建设规划和指导性文件。原“211高校”和“985高校”都力图在原有身份被打破后重新以更高的目标定位自身，力争在新的形势下抓住“双一流”建设的机遇，争取更多资源，从根本上提升学校综合实力，力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陕西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省，但不是高等教育的强省。2016年陕西省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赵正永强调，要统筹推进高教“四个一流”建设，推动陕西省由高教大省向高教强省转变。在我国启动高校“双一流”建设战略和陕西省“四个一流”建设计划的背景下，陕西省高校如何进行“双一流”和“四个一流”建设，政府部门应给予怎样的政策和制度支持以帮助本省高校更快、更好地实现“双一流”和“四个一流”建设目标，是关系到陕西高校在全国高校新一轮洗牌中能否抓住机遇、应对风险，成功实施跨越式发展，以及陕西省能否实现由高教大省向高教强省转变的重大课题，值得每一位陕西省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本文通过对陕西省“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的类型、特点和优势特色学科进行详细探讨，梳理了各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思路，并从陕西省高校建设的共性出发，提出建设“双一流”的对策建议，以期为陕西省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提供参考模式，并为陕西省教育相关部门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出台合理的政策措施、推动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

二、陕西省“211”和“985”学校类型与其“双一流”建设目标关系分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推动一批重点建设高校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带动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迅速缩小了我国与高等教育强国之间的差距，为进一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打下了良好基础。

陕西省共有“211”及“985”学校8所，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同时为211和985学校，西安交通大学为C9之一，也是陕西省唯一一所C9高校。另外5所211学校分别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按照综合类、理工类、农林类等类型划分，8所高校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如图1所示)。其中，理工类3所(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长安大学)，综合类2所(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北大学)，师范类1所(陕西师范大学)，农林类1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军事类1所(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按照主管部门划分，8所高校可以分为3种类型(如图2所示，其中，西安

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直属教育部，西北工业大学直属工信部，西北大学直属陕西省主管，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需要说明的是，在 8 所高校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等 16 个部委和陕西省共建高校，西北大学由国家教育部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教育部和工信部共建高校，长安大学由教育部和交通运输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陕西省人民政府“四部一省”共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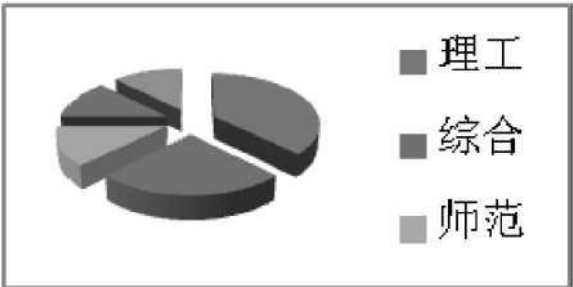


图 1 陕西省 8 所“211”及“985”高校按照类型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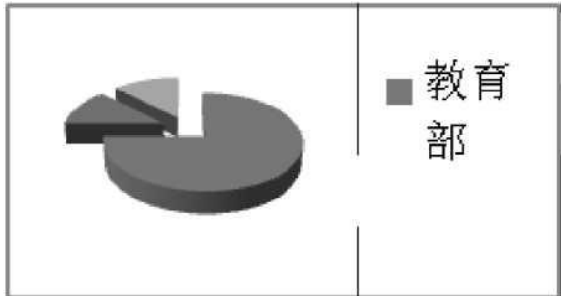


图 2 陕西省 8 所“211”及“985”高校按照所属部委划分

不同类型的高校，其现有优势学科、学科发展水平和师资力量、科研力量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其“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和规划也有所区别。综合类大学是囊括多学门、跨学科和学术知识领域的大学，一般辖有多所学院，其教学和科研力量比较雄厚，优势学科分布较为平均，如西安交通大学的优势学科有电气、机械、能动、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等。理工类大学是指以理工类专业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工程、天文、数学及这六大类的各种运用与组合的广大领域为主要学科的大学，其优势学科主要集中在理工类专业，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优势专业主要集中在电子、电路设计、信息和通信工程方面，长安大学的优势专业主要集中在公路类、地质类和城建类。师范大学正由过去比较单一的培养文、理、工、教人才向更为全面的综合性大学拓展，其优势学科不一而足，如陕西师范大学的优势学科是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等。农林类院校，顾名思义，其优势学科主要集中在农林类学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优势学科集中在植物病理学、土壤学、农业水土工程、临床兽医学等。第四军医大学是

一所为军队培养高、中层次医学专门人才的综合性医科学校，属于军事院校，其优势学科包括基础医学专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和口腔医学专业等。

另外，根据高校的自身定位和现实发展情况，主要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和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如西安交通大学，将力争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一类是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上也有一定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高校，如西北工业大学，可以通过强化主干学科和特色，进入国际同类高校的前列进而迈步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还有一类是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等，则可以把进入这一学科的世界一流水平甚至进入国际同类高校的前列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三、陕西省“双一流”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理念上重视

陕西高校本身由于所处地区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在开放性、思想理念的先进性等方面与北京和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高校相比较，尚有一定差距，更不要说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高等教育领域对于“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的表现给予了更多关注和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双一流”仅仅依靠“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就能建成，并不意味着其他非“211工程”或“985工程”高校不必进行“双一流”建设。对于所有高校而言，“双一流”和“四个一流”建设，都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目标，更指引了一种奋斗的方式和实现目标的途径。陕西省各高校都要牢固树立“双一流”和“四个一流”建设理念，结合学校自身发展定位和发展特点，制定不同层次的“双一流”和“四个一流”建设目标和实施方案。

（二）明确自身特点，准确定位

定位准备是高校“双一流”建设避免盲目性和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不同类型的学校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定位不同，则目标和战略规划也不同，建立在准确定位基础上的“双一流”建设战略和具体规划、实施方案才有可能带领学校实现“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以长安大学为例，长安大学属于一所行业特色鲜明的学校，其公路类、地质类和城建类专业有较强优势，适合从一流学科建设入手，带动一流大学建设。

（三）制定合理、可行的战略规划与实施方案

“双一流”建设的具体实现路径因地制宜、因校而异，但是作为非世界一流学校、非世界一流学科，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学校和世界一流学科，还是有些需要共同提高方面，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建设。

1.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把已有的改革成果统筹到“双一流”建设这个目标之下，从我国的国情、地区情况和高校自身情况出发，

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双一流”建设能够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特别是需要下大力气解决杰出人才的培养模式问题，终结“钱学森之问”。

2. 从师资力量国际化入手，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队伍建设经验，尽早启动师资队伍国际化进程，向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优秀人才敞开大门，同时鼓励教师、学生走出国门，到世界一流大学去参观、学习，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师生进行交流。鼓励教师跨国联合申请项目。

3. 高度重视管理体系和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完善。引进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体系和保障制度并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我国国情的高校管理体系和保障制度。加强产学研合作，全面推进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多渠道获取科研经费，改革并完善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制度，鼓励教师和学生使用科研经费出国交流。制定合理的薪酬机制和激励措施，主要从研究活动本身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辅以适当的物质奖励，不能本末倒置；在学校的公共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建设和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真正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建设便利的学习、生活和发展环境。

全面理解“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内涵很重要，避免片面追求各项论文指标。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大学，需要各学校管理者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切实转变思想观念，找准自身定位，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和管理体制、保障制度以及大学文化建设等方面下功夫，抓住机遇，从根本上全面提升自身的学科实力和综合实力，争取早日达成“双一流”建设中自身所设定的目标。

四、结论

本文针对陕西省高校“双一流”建设问题从理念、定位和方案制定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指出“双一流”建设首先需要理念上重视，其次要明确自身特点、准确定位，第三要制定合理、可行的战略规划与实施方案。规划和方案包括：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从师资力量国际化入手，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高度重视管理体系和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完善；常抓不懈先进的大学文化建设。

该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通过系统分析陕西省 8 所“211”及“985”高校的类型，梳理了各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思路，以及可能的路径选择。

2. 从对陕西省高校“双一流”建设启示性作用的角度出发，归纳和总结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经验。

3. 给出了陕西省高校进行“双一流”建设的对策和建议。限于篇幅，本文对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问题没有多作分析,但该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价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 胡大伟, 长安大学教务处

李 博,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

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2018 年 10 月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的反思与重构

摘 要: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呈现出权力从政府行政控制为主走向多元共治、制度从实践探索走向完善创新、文化从遵从走向自觉自信的新特点。然而,实践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面临着权力失衡、制度局限、文化遵从的现实困境,这不仅从根本上制约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的实施效果,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为此,应从治理呈现、制度创新、文化自觉三个维度重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路径。

关键词: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双一流”; 权力; 制度; 文化

为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2015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至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下文简称“双一流”)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最强音。而要实现“双一流”建设的总体目标,就必须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断完善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但是,在实践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面临着权力失衡、制度局限、文化遵从的现实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一流”建设的进程。因此,本文将从权力、制度与文化三个维度重新审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呈现出的新特点,深入剖析目前面临的发展困境与未来改革路径,以期全面推动“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发展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一、“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新特点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所处的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复

杂的变化，即倡导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强调高校发展的竞争机制，鼓励建立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注重教育投入的绩效导向等。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1.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权力从政府行政控制为主走向多元共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重点发展战略，如“全国重点高校建设”、“211工程”与“985工程”建设项目、“2011计划”等，改善了我国高校的办学条件，提升了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重点建设存在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投资偏向化等问题，阻碍了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双一流”建设是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做出的全新部署，它不仅打破了原先高校发展存在的“身份壁垒”，而且还强化了未来高校发展的竞争机制。例如，“双一流”建设采取“扶优扶强”政策，评价指标吸收社会认可、世界通行的标准，促使高校发展方式从政府行政控制转向高校自主发展；政府财政投入也由原来面向少数院校的重点支持转向现在面向所有院校的竞争性投入。因此，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权力从以政府行政控制为主逐渐向以高校为主，政府、社会等主体共同治理转变。

2.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从实践探索走向完善创新

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关注的焦点。其中，评估作为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是“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共同做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实施了4次本科教学评估活动，分别是合格评估、优秀评估、随机评估和水平评估，并确立了周期性的本科教学评估制度。然而，本科教学评估活动中存在的公众参与度低、评估对象未全覆盖、评估技术不完善、评估标准缺乏多样性等问题，影响了评估制度的有效性。在总结我国教育评估历史经验和借鉴国际教育评估制度成果的基础上，教育部确立了与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相适应的以“自我评估、院校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等”为主要内容的“五位一体”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实现了制度的完善与创新。我国“双一流”建设明确提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就是要在高等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3.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文化从外部遵从走向自觉自信

质量文化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欧洲大学协会指出，质量文化就是组织文化，它包括两个要素。其一是结构或管理层面的要素，主要是指组织或机构的质量程序等；其二是文化或心理层面的要素，主要是指个体成员的共享价值、信念、期望和责任等。质量文化的两大要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我国，高校形成的“崇上”或“崇外”的遵从质量文化，阻碍了高等

教育质量保障的进一步发展。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应不断激活并创新高等教育质量文化，逐渐形成一种由全体成员共同接纳的质量文化，即“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这种质量文化应从外部遵从逐渐向自觉自信转变。

二、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权力、制度以及文化的转变是在认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自觉选择。但是，这种自觉选择难免会存在一些牵绊，不仅影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的实施效果，而且还阻碍“双一流”建设的进程。

1.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权力失衡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围绕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权力行使展开的”，并通过权力配置、资源整合等方式实现一定的高等教育质量目标。在诸多的利益主体和复杂的权力关系中，政府部门、高校、社会与市场三大主体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的主要权力逻辑，并“共同承担着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责任”。然而，在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不同主体之间不断发生各种“权力博弈与利益冲突”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权力失衡。

达尔文·亨迪尔等人指出，政府对高等教育有三种作用，即“规范及提供准确的公共信息；提供财政资助；参与管理。”在我国，政府部门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投资者、举办者和管理者，对高校拥有绝对的办学权和管理权。随着简政放权的不断推进，以行政控制为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通过制定绩效指标、控制资源分配、开展各类评估等手段，要求高校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与问责，并对其提供的高等教育质量负责；其主要目的是要确保高等教育适应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保证高校致力于培养社会需要的毕业生，为改善人民生活进行研究”等。一般而言，我国政府部门主要是根据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结果判断高校工作的效益与效率，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资源分配和一定的人财物管理。

在现实情境中，政府部门主导下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日渐理性化，并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权力谱系中，政府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会削弱高校和社会的权力，不利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健康有序的发展。一方面，过于集中的政府权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高校内部权力分配的状态，增加高校质量保障的被动性，促使高校内部的主动性难以发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规律性受到挤压。例如，虽然高校作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执行主体，却缺乏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资源与权力。为了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名誉以及社会地位等，高校会对政府部门主导的外部质量保障进行回应，其中最常

见的形式是在高校内部简单的复制外部质量保障或者“听命和附属于外部质量保障”。另一方面,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市场力量在不断加强,但是过于集中的政府权力会“挤占社会权力发挥对高等教育影响力的空间”,从而不利于社会公众多元价值诉求的反馈与实现。

多元利益主体积极参与是确保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平稳开展的重要条件。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有赖于治理体系的建构。

2.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局限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是以高等教育评估实践活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主要包括政策法规和组织体系。高等教育评估实践活动的繁荣发展要求加强和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然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在发展与完善过程中还存在着法律法规不健全、组织体系发展缓慢等问题,这导致它并不能对高等教育质量发挥保障作用,进而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有效性。

“制度化是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趋势,多数国家制定有专门性的评估法规予以制度响应。”目前,我国已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6部与教育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仅从法律层面赋予评估制度的合法性,而且还为建立健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但是,现实中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法规建设却滞后于评估实践。例如,《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是我国第一个关于高等教育评估的法规性文件,其中关于评估主体、评估形式、评估机构设置等方面的规定已经不符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需求,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与此同时,我国现有关于评估的一些“意见”、“规范”、“通知”等政策文件还存在法律效力不高,部分规定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此外,目前我国还缺乏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及其具体的实施准则;并且与之相关的各项政策多散见于各类教育政策文本之中,缺乏系统性的设计和整体性的安排。这些问题共同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建设的进程。

组织体系的建立是教育评估活动制度化的重要保证,其主要载体是评估组织或管理机构。我国早期的高等教育评估组织是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体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完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高等教育评估事业的全面展开,各类专业性评估组织逐渐发展起来,改变了单一教育行政部门的组织核心地位,为评估组织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目前我国专业性评估组织多数是教育行政部门直属事业单位,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性质。这类评估组织在人事安排、资金来源、项目申请等方面隶属或依附于教育行政部门,缺乏独立性。还有少数相对独立的、非官方性质的评估组织,由于力量薄弱、缺乏专业的评估团队以及稳定的经费和项目来源,导致它们在评估活动中权威性不强、

社会公信力不高，难以发挥与实际需求相适应的作用。此外，我国受旧有“政社一体”制度的惯性阻碍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专业性评估组织发展不均衡和市场运转不规范。从长远来看，这既不利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体系健康有序的发展，又阻碍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化发展。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制度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路径。

3.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文化遵从

“不同的文化要素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或社会阶级的利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文化要素代表着政府部门、高校、社会与市场等诸多主体的利益。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社会文化价值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对高校的认识和期许与高校本身的文化价值也发生了严重的错位。这些变化在客观上为“崇上”、“崇外”和服从于市场的遵从质量文化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詹姆斯·杜德斯达认为，大学“必须要寻求保留它核心价值中最珍贵的部分”。大学核心价值中最为珍贵的部分就是坚守其学术品性并以“闲逸好奇”之精神追求知识。这与“双一流”建设中强调世界学术前沿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但是，在实践中以外部评估为主的质量文化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学校内部的核心组织文化，强化了外在的社会经济价值胜过内在的学术文化价值的取向。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质量评估能够给高校带来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影响，高校为了取得尽量好的评估结果，会把评估要求置于很高的地位或者选择顺从。评估文化改变了学校以自觉自信为主的文化传统，并在高校中形成了一种以“崇上”为主的文化遵从现象。这不仅扭曲了评估的本意，而且还阻碍了高校的发展。

随着“知识使用价值的日趋凸显”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普遍增长”，市场对高等教育质量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市场竞争作为一种“潜在的质量保障机制”，能够促使高校主动地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并向市场提供质量信息以获得市场信任。但是，过度泛化并趋向以追逐名利为目的的市场竞争，导致高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教育职能与注重“生产服务”的市场价值相联系，例如强调人才培养标准的功利性、知识生产的效益性、社会服务的实用性等。这种以满足市场需求为主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文化的强势入侵，促使高校所坚守的以学术品性为主的文化传统不断遭受重创，不得不服从于市场质量文化，从而丧失了自主性。

此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也为高校模仿和借鉴欧美国家的质量管理经验提供了机会，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但是，“我国当前社会存在一种对待外来文化和思潮的盲目崇拜现象，超越了对待外来文化应有的正常心理和科学态度”。这种“崇外”现象给高校的文化秩序“带来了一种差别心态，即认

为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代表一种历史的先进和优越,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本土文化则成为一种保守和持旧”。从根本上讲,这种对外来文化的过分崇拜与信仰,是一种丧失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自觉自信是高校的主流文化,坚守主流文化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三、“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多维重构

通过反思质量保障活动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我们建议从治理呈现、制度创新、文化自觉三个维度重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为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1. 治理呈现: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实现质量保障的多元共治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运行逻辑依赖于各利益主体的博弈能力及其掌握的资源。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权力“生态失衡和运行逻辑异化”是制约“双一流”建设的关键问题。为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步伐,实现由政府、高校、社会多主体共同治理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我们需要突破高等教育管理的局限,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多主体合作共治的实质是消解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单一化、强制化的权力逻辑,并通过对不同权力的平衡与协调实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合力逻辑”,即最大限度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整体效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不同权力主体“因性质各异而存在,因职能分离而增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办评”分离是实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多主体合作共治的重要路径。因此,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明确政府、高校和社会三大权力主体的职责分工,打破政府越位、高校失位、社会缺位的权力局面,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权力制衡机制。

具体而言,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权力制衡机制的前提是政府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通过简政放权增强其对高等教育的服务性职能,科学预估高校的“自主能力和社会责任能力”,为确保高校有效地承担高等教育质量责任提供政策与资源支持,建立积极稳妥的“放权”机制;核心是高校要深入落实办学自主权,增强质量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完善其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形成以内促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机制;关键是社会公众要增强质量监督与问责意识,积极参与高校办学水平及其教育质量的评价活动,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机制。只有坚持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主导作用,发挥高校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主体作用,肯定社会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关键推动作用,我们才能突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权力失衡的局面,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多元共治的新格局。

2. 制度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实现质量保障的制度引领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根植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实践探索，且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及相关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局限，不仅制约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持续提高，还影响了“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为构建与“双一流”建设相适应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发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引领作用，我们需要在结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以及借鉴国际社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法制化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建设有序运行的基本前提。因此，立法部门应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理念和成功的立法经验，结合“双一流”建设的实际需求，从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开展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专门立法工作。其重点是要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专门性法律法规，明确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地位。这既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领域存在的评估政策法规滞后、法律效力低下、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又能促使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的法制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还要对评估组织制度进行明确规定，尤其是要明确各类专业性评估组织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构建一个完善的质量保障组织体系框架。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借鉴一些国际性或区域性质量保障组织的成功经验，积极培育质量保障组织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行业认可与自律管理作用，加强评估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评估组织的规范化运行。例如，建立健全评估组织的资格认证制度，对评估组织实行市场准入，确保评估组织的专业性、独立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评估组织还要通过完善内部管理、加强人员专业培训、开展或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或国际交流活动等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其专业化与制度化水平。自觉自信：发展高校内部的质量文化，实现质量保障的文化自觉。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不仅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官僚式”管理技术，还是“高等教育机构中集体的共识”。在实践中，管理主义文化的不断渗透、功利主义文化的强势入侵以及对待外来文化的过分崇拜等现象削弱了高校以自觉自信为主的文化传统，并且这种文化遵从现象还阻碍了“双一流”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为推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文化走向自觉自信，实现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目标，我们需要在高校内部发展出一种自觉自信的质量文化。

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与自我创建。因此，高校质量文化建设要立足于学校的历史与现实，不断审视学校自身文化，

批判性地借鉴外来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主动地激活高校组织文化中与质量相关的基因，自觉创新质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首先，高校要在质量文化建设中掌握主动权，准确客观地把握质量保障的文化内涵，克服“崇上”的文化弊端，抵制功利主义与世俗文化的侵扰，实现由被动遵从到自我觉醒的文化转变。第二，高校要重新调整质量文化秩序，抛弃对外来文化的过分崇拜，以平和之心对待外来文化，自觉肩负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崇高历史使命。第三，高校还要积极营造自觉自信的质量文化氛围，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一种质量文化愿景。只有当这种质量文化愿景成为学校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信念和行为准则时，才能形成强大的文化凝聚力，激励并指引学校全体成员走向提高与保障质量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主动承担“引领社会文化和影响公众舆论”的责任，进而在学校内部建构一种“能够反映大学精神品性与时代特征”的质量文化体系。同时，各高校内部质量文化的持续发展与不断提升，又会促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文化走向自觉与自信，并最终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内形成一种自觉自信的质量文化氛围。

总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权力、制度、文化三者之间是相互贯通、互动共生的。在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能够有效减少权力配置失衡所造成的各类集权或权力寻租等现象。制度经过不断发展与完善逐渐“退出正式规则领域”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进而内化为文化。而文化既能够弥补制度局限，促进制度的完善与健全，又能在潜移默化中规范和约束不同主体的行为方式，强化他们的制度认同。因此，从权力、制度与文化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与“双一流”建设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既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求，又是这一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历史使命。

作者：许晓东，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赵幸，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9月

治理“水课”打造“金课”

摘要：分析了高校“水课”存在的环境以及基础教育为何没有“水课”的原因，提出“金课”的基本特征，即师生互动、关注过程、严格要求，进一步给出了治理“水课”、打造“金课”若干途径，即教师为中心到学生为中心、考试为中心到学习为中心、学科为中心到专业为中心的转变。

关键词：水课；金课；教师；学生；途径

一、“水课”因何存在

何谓“水课”？可以认为是质量不高的课程统称。有人云，有些课程很“水”，“水”到可以游泳了。但曾几何时，学生对“水课”爱恨交加，爱它吧，不学照样可以拿高分；恨它吧，学过与没学过几乎没区别；然后你让学生选课呢，他往往又不由自主地选“水课”。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不良的默契，老师或许想着如何给学生送分，学生想着如何向老师要分。不要以为基础课程比较“水”，其实专业课程的“水”或许隐藏得更深。所谓的“清考”，大部分发生在基础课程，专业课为何很少需要“清考”？因此可以认为，专业课程的质量提升任务并不轻松。

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为什么不存在水课？因为没有水课存在的土壤。老师拼命教，学生更是拼命学，就是为了考上大学，特别是为了考上所谓的“好”大学。正所谓“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何其残酷，怎能不拼命？老师和家长一直灌输的是，初中辛苦，高中更辛苦，高三最辛苦，接下去的意思就是，只要进了大学，一切尔尔。12 年基础教育形成的这样一种观念，要想立即转变，客观上存在一定难度。亦即大转变大学治理“水课”的信息要逐步地反馈到中学，让我们的学生及早做好思想准备。

我们的高等教育为何“水课”不少？主要是我们的淘汰率偏低，也就是毕业率或学位授予率太高。我们的学习年限 $X+2$ 年的毕业率或学位授予率低于 90% 的高校似乎不多，甚至有人云，如果以毕业率或学位授予率给世界一千强大学排名，或许大部分高校会来自中国。由于淘汰率低，反馈到大学学习阶段就是没有形成学习的压力，得过且过，你不过可能还有人帮着你过。试想，人都是有惰性的，不付出或者少付出都能得到想要得到的，大部分人或许就不太想付出了。

二、“金课”基本特征

何谓“金课”？可以认为是高质量课程的统称。这里所指的“课程”，总体而言还是以课堂为核心，涉及课堂内外、课程始终、师生角色、考核评价。“金课”的基本特征或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师生互动、关注过程、严格要求。

1. 师生互动

教师与学生永远是教学最主要的两个要素。教育部正在推行的“课堂革命”恰恰就是要革

除当下知识本位、教师主体、教室局限的弊端，而师生互动可以认为是“课堂革命”最好的切入点，也是最佳的评判点。互动可以分为五个层面，其一称“单声道”，只闻老师讲；其二称“Q&A”，偶闻简问答；其三称“互动”，不仅是“教”，更是“学”乃至“研”；其四称“质疑”，学生能提出问题，不惧权威，发散思维；其五称“辩论”，如果师生能唇枪舌剑，妙语生花，岂不妙哉！总体而言，我们的教学大多还是处于第一第二层面，因为满堂灌是完成教学任务效率最高的途径。因为层面越高，教师就需付出越多，然而又很难评价，教师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2. 关注过程

教学是教与学的过程，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的不同阶段，不应该只是课堂教“知识”、期末考“知识”的状态。严格而言，缺乏过程的教学不是真正的教学。我们对于“考试”和“分数”过于崇拜，以为考得好，一切都好，而所谓考得好是以分数来衡量的。所谓“四考”定未来，初中毕业的“中考”，高中毕业的“高考”，不少人本科毕业考研究生的“研考”，还有不少研究生要考公务员的“国考”。实际上，只是考得好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足以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考试涉及的往往是知识，考得好表明他记忆力超群，或是揣摩标准答案的能力超强，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够真正地投入，真正地有付出，更有收获，是值得不断探索的。

3. 严格要求

老师与学生之间不应形成不良的默契，而是应该成为互相促进的教学共同体。学生给老师评价的打分越来越高，很少见到 90 分以下的评价，老师有时为了得到高分，讨好学生，或者怕学生不给高分而放松对学生的要求；老师给学生的打分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些课程最低分都达到 90 分，课程评价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带来的效应是分数的虚化和过度高企。有些学校教务部门对教师给出了一些限制，比如 90 分以上不能超过多少比例，比如 70 分以下不能高于多少比例，否则成绩不予录入，但总有教师不予遵守。当然，课程不及格比例过高也是不合适的，这与严格要求并不是等价的。

三、治理“水课”、打造“金课”若干途径

1. 教师为中心到学生为中心的转变

韩愈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真可谓路人皆知，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即使做到了也还需要上升一个层次。因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是以教

师为中心的，尽管可以人人为师、能者为师、互为师生，但就其根本而言，是忽视学生的。那么，作为学生的“学者”该如何呢（注意，不是“考者”）？个人提出“学者，所以悟道求业生惑也”，所谓悟道、问道、寻道，求是、求学、求真、求业，并且在此过程中产生更大的疑惑，才有可能培养创新性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悟道求业生惑”的主角毫无疑问是学生，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主动行为，犹如毛泽东所言，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高等教育还是应该并且必须做出改变，这是基于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三个基本判断做出的，即大学教育与中学区别不大，大学之间教学区别太小，中国大学教学与国外差别较大。但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国外，否则我们的学生不适应、教师不习惯、资源也不够，我们必须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路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考试为中心到学习为中心的转变

考试的作用和意义不须赘述，学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基本做法就是降低期末考试的比重，如果降到 50% 以下会怎样，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学习过程加以评价？包括课前的预习、课中的互动、课后的复习或研习。个人提出“三一机制”和“三自模式”。

所谓“三一机制”，即“一门课、一千字、一刻钟”。对于通识课或者大类课而言，让学生写 1000 字并不会太困难，甚至 3000 字或者 5000 字；对于专业课而言，让学生上台讲一刻钟也并非难事，并且我们发现，当学生上台讲述的时候，学生们的头是抬着的，“抬头率”十分重要。这样的“三一机制”，或许使得学生的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有了真正的培养途径。

所谓“三自模式”，即“自主命题、自我测试、自行评价”。对于期中测验位于前 20% 的同学，可以申请不参加常规的期末考试，虽然不考，但要求学生自己设计考卷，把答案全面求解，描述这样出题的体会。学生也可以感受出题之不易，试题需要信度、效度和区分度，谈何容易。学生的感受是深刻的，如此设计学生必然能够站得更高、想得更多、看得更远，这也可以认为是教育真正意义之所在。

3. 学科为中心到专业为中心的转变

学科是重要的，科研是必要的，高校必须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对人才培养而言，特别是对本科人才培养而言，更重要的是学科要支撑专业，科研优势应该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

然而，“三重三轻”现象还相当普遍地存在，即“重教书、轻育人，重智育、轻德育，重科研、轻教学”。必须转向真正关注学生成长，亦称“成长比成功更

重要”，或称“成长是最大的成功”，我们也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这是上下联，那么或许横批就是“教育之道”。

学科的评价相对容易实施，主要的因素是科研；而专业的评价则要困难得多，主要的因素恰恰是教学。目前高校排行榜众多，但总体上看是偏于科研的，或是基于长期的声誉的，本科教学对于高校排行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否应该改变对高校的评价策略？

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委托，我们项目组推出了学科竞赛高校排行榜，试图从一个侧面关注人才培养，可以说是第一个关注人才培养的排行榜。已经发布 2012—2016 年排行榜，2013—2017 年排行榜，即将推出 2014—2018 年排行榜，既面对本科，也面向专科，还有分省排行，总体反响良好。

治理“水课”、打造“金课”需要社会、学校、教师、学生的共同努力，其中最基本的是学校的教风和学风，最根本的是教师和学生观念的转变。淘汰“水课”、打造“金课”，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项行动，必将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必将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陆国栋，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来源：《中国大学教学》，2018 年第 9 期

关于“双一流”建设若干关系的思考

摘要：“双一流”建设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重点建设战略，既体现了政策的延续性，也有着较大的不同。在当前形势下，“双一流”建设需要处理好国家整体布局的“双一流”建设任务与高校整体建设的关系；把学科评价与为产业行业服务结合起来；把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统一起来；把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和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调整对应起来，营造良好的大学氛围，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关键词：重点建设；“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中，政府的重点投入是推动高校发展不可忽略的因素，其体现的国家意志、政府主导，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大概经历了6个阶段：重点大学、重点学科、“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双一流”建设。这6个阶段在时间上有交叉，在范围上有变化，在建设思路上也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先对“双一流”建设的变与不变进行审视。

一、“双一流”建设的变与不变

1. “双一流”建设的不变

“双一流”建设的不变在于坚持高等教育的重点建设，这体现了政策的延续性。从遴选结果来看，原“985工程”大学都进入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议名单，原“211工程”大学都进入了“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议名单。这一结果肯定了以往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已经取得的成效，这也是开展“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双一流”建设是中国特色的产物，“211工程”、“985工程”是“双一流”建设的逻辑起点和继承基础。此外，根据“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编写的《211工程”发展报告（1995—2005）》，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211工程”正式启动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可以看到，“211工程”将重点建设高校与重点建设学科两者并列以及重在建设的思路与“双一流”建设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重点建设所起到的作用，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金子元久在讲述正在崛起的亚洲旗舰大学时，提到他初次到中国直至十几年后他所看到的中国大学的“飞跃变化”。他认为，“在中国，对少数大学的战略性重点投资和对尖端研究人才的优惠待遇以及吸引欧美等国研究人员回国政策，正在以激进的形式推行”。

重点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也可以通过大学排行榜体现出来。虽然社会上对于各

种大学排行榜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学排行榜作为衡量高等教育发展以及进行国际比较的“尺子”值得我们关注。国内一位大学校长说：“作为校长，我不太关注学校在具体哪个位置，我关注的是它在排行榜上变化的趋势。”

目前，世界大学排名中认可度比较高的四大排行榜，分别为美国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英国 THE 世界大学排名、英国 QS 世界大学排名和中国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四大排行榜的指标体系各有侧重，比如 U.S. News 重点关注机构的研究水平，QS 则比较关注相关者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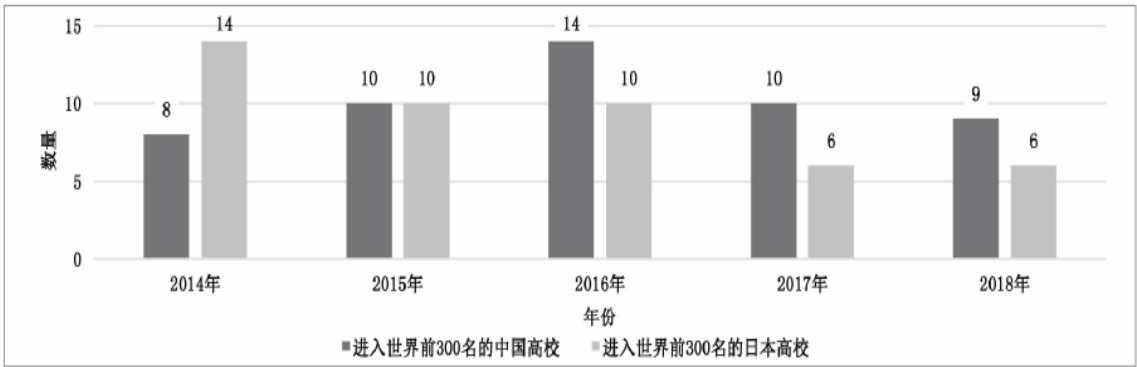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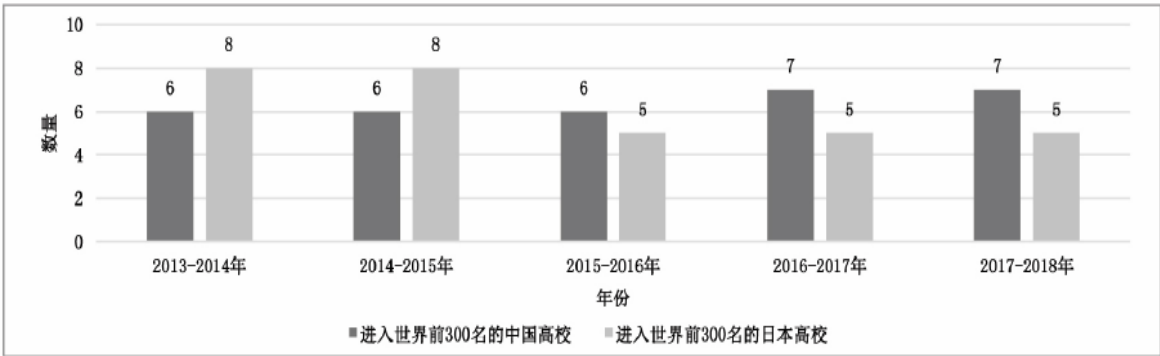


图 2 英国 THE 世界大学排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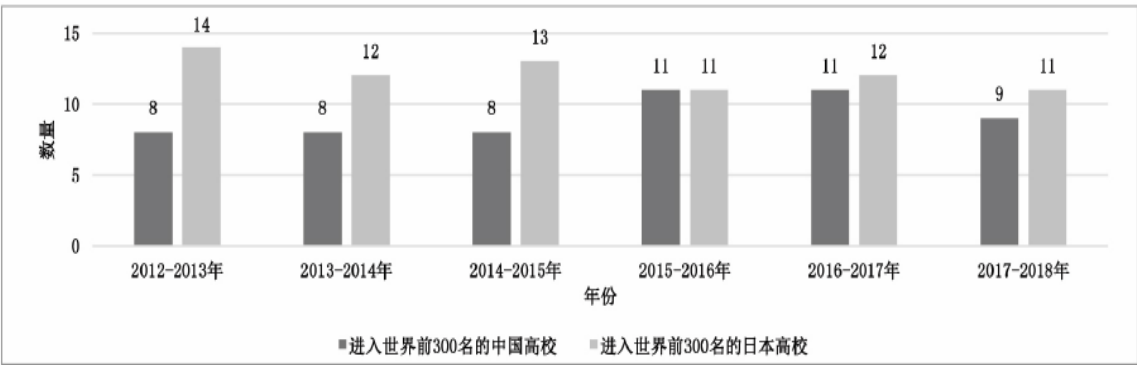


图 3 英国 QS 世界大学排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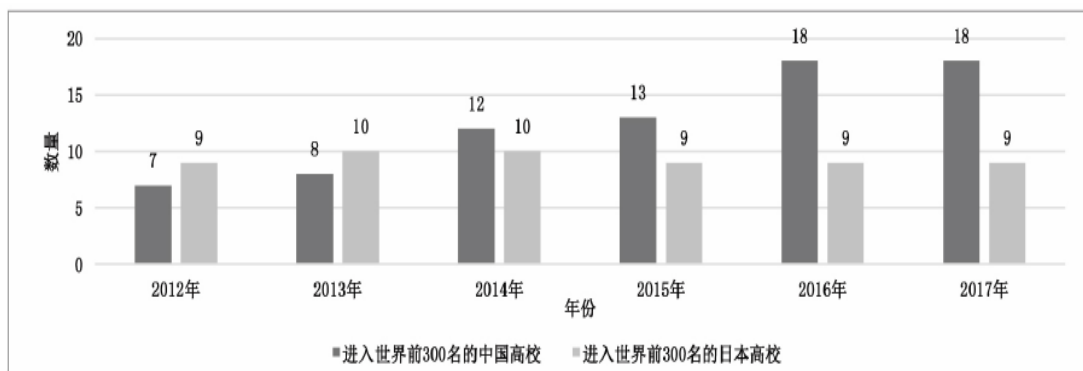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

从图1—4中进入世界前300名中国高校的发展趋势来看,近几年这些高校的发展呈上升势头。对比日本高校的表现,中国高校也一直在缩小与日本高校的距离,甚至在数量上还有所超越。即使对比进入世界前100名高校的数量和排名,中国高校与日本高校也不相上下。

郭新立通过分析大学功能累计分布规律认为,长期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重点建设是在资源相对不足情况下发展高等教育的有效措施,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水平是行之有效的。除此以外,重点建设道路也开始被世界学习与模仿,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方案。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研究室主任马陆亭提到:中国的“211工程”、“985工程”举世闻名,他到国外访问或在国内接待外国代表团来访时就经常被问起。尽管难有确凿证据表明德国的“精英大学计划”、日本的“21世纪COE项目”、韩国的“21世纪智慧韩国”、俄罗斯的“创新型大学评选”等是在学习我们,但我们的“211工程”、“985工程”先于他们也是不争的事实。

2. “双一流”建设的变

此次“双一流”建设,除了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身份固化等诸多变化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即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增加,如“双一流”建设方案的编制就体现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在方案编制方面,根据“双一流”建设方案的编制要求,建设目标可以是学科,可以是学科群,也可以是学科领域。这样就把学科建设的组织权交给了高校,给予高校比以往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一位高校的书记也提到:“双一流”建设已经开始体现出这种思想了,自己确定建设项目,自己想要怎么干,过去“85工程”高校在人员投入上还有一定的比例,现在都没有了……国家在重点建设项目上的管理也越来越宽松,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

3. 变与不变背后的逻辑

大学更多的是环境的创造物,并与它们的环境一样,始终处于运动中。它们的发展并非固定模式所揭示的那样自主独立,外部环境的变化会以一种它们不能

抗拒的方式给它们带来影响。高等教育的重点建设也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时代背景的影响。

举例来说，林毅夫在分析中国改革的道路和经验时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4个特征：（1）做大蛋糕；（2）增量改革；（3）试验推广；（4）非激进改革。对比来看，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与中国经济改革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试验推广方面，重点建设高校的改革举措就很快被其他高校学习。在中国，高校间的学习热情很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也经常举办各类培训班，搭建经验交流与学习的平台。有学者指出，我国重点大学建设采用了小步快走、积小变为大变的政策模式，呈现出渐进性特征。这一特征与经济领域改革的特征也是一致的。

另外，在“双一流”建设中，谈到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增加，就不能不提到政府层面的“放管服”改革。在《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7〕7号）中，针对学科专业设置、编制及岗位管理、进入用人环境、教师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经费使用管理以及内部治理等方面的问题，明确给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从政府来看，简政放权是手段，根本目的是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是说，既要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下去，也要把该管的事项切实管住管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体现在“双一流”建设上，一方面，政府给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绩效考核等方式加强对大学的考核和评估。

因此，要理解“双一流”建设的变与不变，关键在于理解时代背景。只有关注时代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双一流”建设。

二、“双一流”建设需要处理好若干关系。

1. 重点建设与整体发展的关系

通过重点建设，可以使一批高校的办学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在世界高等教育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重点建设还将带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流动主要指重点建设高校的教师和毕业生在高校间的流动。金子元久认为，中国等东亚国家对大学的投资尽管集中于特定的学校，但研究者的流动性很强，研究者间的竞争激烈。人才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水平。

（2）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重点建设已从国家层面向地方层面传递。从各地相继出台高水平大学建设相关政策的现实来看，“双一流”建设已激发了地方政府进行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热情，很多省属高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高校的受益面也不断扩大。此外，政府在制定重点建设政策的同时，也对中西部地区

的高校给予了重点关注，实施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中西部高校能力建设工程”等。

(3) “双一流”建设提出要打破身份固化，这给很多高校带来“弯道超车”的希望，高校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高校发展的作用。

(4) 一般来说，重点建设高校往往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体现在教育综合改革、教育教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学科建设、大学治理等诸多方面。此外，高校间的帮扶政策也有利于被帮扶高校的发展。

(5) 高等教育的重点建设已经扩展到各级各类高校。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既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提出建设高水平应用型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并且提出要“积极探索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一流建设之路”。在应用型高校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等方面，国家都已出台或正在酝酿相关的重点建设方案。

2. “双一流”建设与政府、产业的关系

(1) “双一流”建设要处理好政府布局 and 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关系。对于公立大学来说，政府是大学的举办者。从法理上说，政府的授权是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来源。因此，办学自主权的行使首先要体现举办者的布局和意愿，而这部分往往是缺失的。一位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校长提到：“政府领导每次来学校，当着外方的面都问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但从来不说有什么要求。学校想做，地方也想做，但外方合作高校会以办学成本高为由，一直拖在那里。”他认为，政府作为大学的投入者，对大学的发展要求，应该当面提。对“双一流”建设高校而言，要处理好国家整体布局的“双一流”建设任务与高校整体建设的关系。一方面，“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使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因此，国家引导一批学科基础好且有望冲击世界一流学科的高校在自己的优势学科上发力。“双一流”建设方案编制要求也对这批高校进行了布局，希望其担当起这个使命。另一方面，国家布局的一流学科建设并不是高校重点建设的全部。“双一流”建设并不妨碍高校在其他学科的重点建设、新兴学科的布局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

(2) “双一流”建设与产教融合的关系。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将‘双一流’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与产业化链条”。这是政府首次把“双一流”建设与产教融合联系在一起，且在遴选“双一流”建设高校时，还增设了获国家科技奖励三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的入选条件，体现了政府和产业界的需求。产教融合的思想也体现在“2011计划”中。“2011协同创新

中心”有4种不同的模式。其中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主要是学校之间的协同，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体现的是学科方面的进步。而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则直接体现了产教融合的思想，如苏州大学对接苏州市支柱产业，牵头成立了苏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并在此基础上迅速集聚一批国内外高水平人才，实现了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快速提升。

3.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1)厘清学科与学科建设的内涵。以学科为基础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原则。通常ESI所说的“学科”，指的是知识分类的概念。但是学科建设中的“学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是指科研或者研究生教育，还是一个组织概念，它包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的内容。既然学科建设是一个组织概念，如果要强化一级学科的概念，就不仅仅是相关材料的组合，更是组织形态的改变。按照一级学科来进行组织形态的调整，可能有利于推动学科交叉，进而有利于一级学科真正意义上的壮大。组织形态的改变主要体现在院系调整上，如大连海事大学在航海学院和轮机学院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和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接下来，组织者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旦按照一级学科来组织学院，院长的人选就很关键，因为他不仅仅是院长，更是一级学科建设的协调人。

(2)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一般来说，特色专业往往依托的是优势学科。同样，学科水平直接影响本科教学水平，教学改革做得好的高校，其学科水平通常也比较高。对此，一位高校校长表示，专业要建立在学科上，未来进行专业动态调整时，要以学科水平为基础，实现学科、专业联动。此次“双一流”建设高校遴选中有关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要求，也说明了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与教学质量是高度相关的。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科研来促进教学上。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期间，笔者对一所高校2012届（毕业五年后）本科毕业生职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从4277名本科毕业生中抽取样本353人进行电话访谈，获得有效样本341份，有效率达96.6%。毕业生给学校的建议是希望“提升学生科研能力”。这就给高校下一步开展教学改革工作提供了思路。比如，实行导师制时，可考虑在教学过程中提高本科生参与老师课题的比例以及毕业论文与老师课题相关的比例。

4. 大学与学院的关系

“双一流”建设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紧密相关。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深入，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也将随之改变，主要体现在大学与学院的关系方面。

大学是一个“底部沉重”的组织。大学最知名的教授、最具权威的学者和专家都分布在基层。“双一流”建设要想收到实效，就需要学院和教师行动起来。

而提升教师的能动性并不是增加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就能够解决的，还需要调整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对此，一位高校领导说：“人才培养靠谁？科学研究靠谁？最后回归到谁？不是大学校长、书记，不是大学机关、学院，最后要回归到大学基层组织。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政策导向，最后都要去激发基层组织的活力。我们不要被所谓轰轰烈烈改革的假象所迷惑，所有的改革如果不能改变教师的教育行为，不能改变学生的学习行为，所有的改革都是无效的。”

目前，国内高校对于校院两级管理的关注比较多，如武汉大学开展以财务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综合改革，稳步推进了该校两级管理体制的改革，激发了学院的办学活力，提高了学院的办学自主权，同时也尊重了学科发展的差异性，让学院能够按照学科特点进行发展。这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深入的高校。同时，笔者也看到部分高校存在这样的现象：学院领导对于校院两级管理的认识还停留在权力的下放上，比较在意经费的获取，对利益的考虑多了一些，对责任的关注少了一些。因此，有必要对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深入思考。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校院两级办学，而不是为了分权。管理重心下移后，因为学院的领导有一定的政策制定权和资源配置权，于是他们从找问题的人变成了解决问题的人。

作者：王旭初，中山大学

黄达人，中山大学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5月

国际视域下的“双一流”建设及其中国特色体现

摘要：我国已经启动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在“双一流”建设中，如何基于世界一流大学的一般办学规律和办学特征，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这个问题值得探索。从世界一流大学的视野出发，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应该在学科方向、学科平台、本科教育、国际名师、国际教育、社会服务这六个方面创出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同时，还可以从多校区建设、新模式发展、国际校区探索、汉语国际传播四个方面实现“双一流”建设的“弯道超越”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主要特征；“双一流”中国特色；弯道超越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9月21日，国家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公布“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对于如何建设一流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2016年3月，QS全球教育集团中国总监张曦博士评价说，中国已有98所大学的学科达到世界一流学科水准，居世界第二位。他乐观预测“通过国家与地方紧密合作，积极鼓励并扶持中国2000多所地方院校，逐步建成有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特征研究，一方面，有的学者倾向于研究具体的指标和特征，包括科研指标、培养质量、教学设施、大学管理等。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倾向于研究更为抽象的概念，例如大学的国际声誉、大学的社会贡献。

总体看来，世界一流大学描述多样，但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很难用一把尺子或一个模式进行比照。基于国际视野的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办出世界水平、争取弯道超越。

一、基于国际视野，凸显中国特色，体现“双一流”建设的六大特征

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应注重从学科方向、学科平台、本科教育、国际名师、国际教育、社会服务这六个方面入手，提升水平、办出特色、引领发展。

（一）要拥有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科方向

每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有闻名世界的学科方向。例如，耶鲁大学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生命科学，麻省理工学院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普林斯顿大

学的数学、哲学、政治和经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和软件等。中国一流大学建设，比较鲜明的特色就是在大国崛起进程中，体现出“顶天立地”的作用“顶天”，就是面向国际学术前沿产生重大原创成果，推动知识传播“立地”，就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地方区域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立足中国大地，办出一流学科，这是当下高校需要关注的发展路径。例如，在测绘学方向，武汉大学走自主创新道路，遥感测绘研究公认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华中科大通过高档数控、电子制造等技术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其机械学科被评为全国 A+ 学科，在 2017 年 8 月组织的国际学科评估中该学科被评价为已经跻身世界一流水平行列。在民族学研究领域，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在国内外都颇具特色和影响力。在第四轮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华中科大光学工程被评为 A+ 学科，并列全国第一名。该学科一方面强调要为全球基础研究做出贡献，产生更多原创性重大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强调要服务“武汉·中国光谷”，在信息光电子、能量光电子、生命光电子等领域，通过技术转移、工程示范、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政策咨询等方式，为区域经济转型发挥推动作用。

（二）要拥有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的学科平台

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建成一批重大国家级、省部级学研产结合的开放平台，使其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形成重大支撑和带动作用。例如，英国剑桥大学拥有卡文迪许实验室，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设了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这些平台，从体制上可以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推动了学术交流和科技进步。根据我国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建设大型光学红外望远镜、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 10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每个项目投资都在数亿或数十亿元。中国一些高校，例如华中科大，也正在建设一批公共开放、资源共享的平台，其中包括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强磁场国家大科学工程、精密重力测量国家大科学工程。这些平台将为高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国际教育合作提供支撑，推动建设高校成为国际学术重镇和国际交流高地。“双一流”建设中，高校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校内外师生高效率、高水平的资源共享，并向全球科学家开放，成为国际合作和交叉研究的创新高地。要推进这些平台向本科生、研究生充分开放，坚持用高水平科研带动高质量教学。

（三）要办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本科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国内外一流大学莫不将人才培养尤其是本科教学质量作为立校之本。本科教学是一流大

学的灵魂和立校之基。一所研究型大学高度重视本科教学，表明这所大学在迈向成熟、迈向一流。中国一流高校的本科教育质量已经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同。同时，中国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本科教育，还要体现三个原则：一是红专结合原则，即能否培养出忠于祖国人民、具有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敢于迎接挑战的人才，要让他们成为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的优秀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二是能力导向原则，即通过宽口径、厚基础的本科教育，毕业生可塑性极强，具备超于常人的继续学习能力、再创新再创业能力；三是国际检验原则，即所培养的本科生总体成功率和满意度居高校前列，能够培养出一批国家领袖、学术大师、工商巨子以及各行业精英人才。

（四）要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大师和教学名师

大学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拥有一批引领学术发展、影响人类进步、启迪学生心智的优秀教师，尤其是大师级学者，是世界一流高校的首要特征。美国高等教育引领世界发展，最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从一战、二战到之后，美国本土没有经历过战火，经济发展持续增长，全世界大批优秀科学家、学者云集美国。20 世纪，美国在自然科学领域涌现出了 206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多数人都是大学的教授学者。哈佛大学拥有美国三院院士达 300 余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毕查德·拉扎维教授，是世界知名的电路与系统专家。他虽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他的科研教学成果丰硕，尤其是他编著的《模拟 CMOS 集成电路设计》一书被全世界一流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师生誉为“模电圣经”，畅销全球至今。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教育崛起，中国已有一批大学跻身全球大学方阵的前沿。

“万人计划”、“千人计划”、高端外专引智计划等人才项目的吸引力与日俱增。潘建伟、施一公等一大批华裔顶尖学者已经做出了“中国气派、世界一流”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全球优秀教师和学者也将中国一流大学作为其职业选择之一。当前，“双一流”建设中，各个高校的国际名师、教学大师的培养，显得尤为迫切。高校在教师队伍建设中，既要崇尚科研学术、工程学术，还要弘扬教学学术，鼓励教师钻研教学、传承知识、教书育人。我们既需要培养一批学术大师，还需要培育一批德艺双馨的教学名师。

（五）要能够吸纳一定数量并认同中国文化的国际学生

生源来源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表明该所大学品牌的美誉度和含金量，也代表该大学的全球视野和国际贡献。国际上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出国留学学生比例为 10%-15%，表明该校已经迈入国际化高校的行列。据《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留学生占比达 41.4%。2017 年 3 月，软科发布的“2017 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一学生国际化排名（留学生比例）”显示，全国原 985 高校的留学生占比均未超过 10%，清华、复旦、上交、北大等名校留学生占

比均只有 6%-7%，其他原 211 高校多数在 5% 以下。我们要提高国际学生对中国教育模式、教育质量、中国文化的认同度，就要提升国际学生占比。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高校有比较成熟完备的国际化课程体系，有一支善于跨文化交流的高水平教师队伍，有比较好的国际学术交流氛围和与国际接轨的教务、后勤等配套服务体系。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向好的大背景下，中国民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日益增强，一定会吸引更多优秀国际学生加入中国高等教育的怀抱。

（六）要具有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球公共事务的强大能力

世界一流大学有两项重要的社会服务使命和义务。第一是国家使命。众多世界一流高校逐步迈出象牙塔，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这些大学都肩负着国家使命，要服务于所在国的国家教育科技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斯坦福大学的特曼教授，后来被誉为“硅谷之父”，他在 1951 年就提出要创建斯坦福研究园区的大胆构想。后来，斯坦福大学推动了大学周边科技园的建设，使“硅谷”成为大学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典型模式。中科大建校 65 年来，通过政策咨询、技术转移、工程示范、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式服务国家战略和“武汉·中国光谷”的区域发展，在光电子、微电子、先进制造等领域，成为国家技术转移的重要力量、区域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依托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新型智库，充分发挥中国智库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等一批高端政府智库蓬勃发展起来。第二是全球使命。这些一流高校要仰望星空，关注全球公共事务，研究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全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战争问题、生命问题，等等。2017 年上海交通大学与英国爱丁堡大学共建中英低碳学院，就是这一使命的体现。

当然，我们的“双一流”建设，还需要非常强大的财力投入支持，这是所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支撑。

二、立足中国国情，加速实力跃升，实现“双一流”建设的“弯道超越”

发挥中国体制机制优势，调动国家、地方、企业、学校等多方面优势，中国大学完全有可能在较短时间里，加速实现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实力的巨大提升，实现在全球大学竞争中的“弯道超越”。目前，我国大学的“弯道超越”努力，有如下 4 种发展范式。

（一）在经济活跃区域，建设多校区发展模式，实现大学实力跃升

美国许多世界名校，都是由多所知名分校(或校区)组成。例如，加州大学系，包括了伯克利分校(UCB)、洛杉矶分校(UCLA)等 10 个分校。全美知名的公立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系统，包括了波德尔、丹佛、科罗拉多泉等 3 个校区。中国一些知名大学，也在通过扩充校区，争取资源，赢得发展空间和机遇。例如，早在 2015 年，中山大学就曾提出大学“倍增计划”，包括实现发展物理空间倍增、总体办学经费倍增、人才储量倍增。中山大学重点建设了广州、深圳、珠海等 3 个校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巨大财力和政策支持。2018 年 3 月，中山大学再次提出了堪比办学指标“再倍增”计划，3 年后力争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学科数增加到 18 至 22 个，总体办学经费达到 120 亿至 150 亿元规模。地处东北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在经济活跃地区布局建设了哈工大威海校区，哈工大深圳校区等。

（二）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后发优势，高标准高起点建设新模式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于 1986 年筹建，1991 年正式挂牌建设，经过短短一二十年的建设，其就快速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香港科大的一流奇迹，缘于其在香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大背景下，创新体制机制，发挥后发优势，高薪诚聘全球优秀教师，实现了“弯道超越”。中国内地目前也在探索新的模式，创立高起点、高标准的一流大学，西湖大学就是典型一例。2015 年 3 月 11 日，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等 7 人，正式向国家提交了《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性大学的建议》，并获得了支持。2016 年的 12 月 10 日，西湖大学前身和筹建依托主体一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据西湖高研院官网介绍，该研究院“是一所新型非营利高端科研机构”，“致力于探索与国际一流科研机构接轨的现代科研体制和创新培养模式”。西湖大学校区将在 2018 年开工建设，这所大学“定位为新型民办、小而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总体规划面积约为 3000 亩”。西湖大学着力创新办学体制机制，《人民日报》报道，该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经费来源为社会捐赠、办学收入等”，教育界和社会公众对这一新模式大学能否快速实现“双一流”报以很高期待。

（三）在中国本土或国外建设国际校区，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

近 5 年，中国政府批准建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量增多，层次提升。其中，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联合国外名校，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建设了国际校区，引起了高等教育界广泛关注，成为“双一流”建设新的引擎。浙江大学于 2013 年 2 月启动筹建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即海宁国际校区)，并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获得教育部的批准。2016 年，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这 2 个实体办学机构启动本科招生，

“浙江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应用数据科学联合实验室”也已正式成立。2016年11月，清华大学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办学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拓展升级，共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校区。此外，北大、浙大的海外国际校区建设也开始启动。2018年3月25日，北京大学在英国牛津，举办了北大英国校区启动仪式。“北大英国校区是中国高校在发达国家设立的第一个独立投资、独立管理、拥有独立品牌的高校校区”，“是一个在海外真正属于中国的大学校区”。浙江大学近几年也在积极推动，拟在英国帝国理工建设国际校区和国际联合实验室。

（四）依托高校加强汉语国际传播，提升国家文化感召力和影响力

“推动汉语的国际传播不仅是适应和满足世界各国急速增长的对汉语的需求，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我国高校优势，加强汉语言的传播，对于促进经济全球化、消除贸易保护主义、造福更多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在我国相关高校的推动下，全球目前共有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分布在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近些年来，中国高校通过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举办了“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有的高校与海外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大学日等活动，传播了汉语言文化。高校这些办学工作，实质是对全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和谐共生、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所做的贡献。

三、结语

总之，我们要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扎根中国大地办一流大学，最终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巨大跨越，并努力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

作者：刘继文，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学院党委书记

聂明局，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学院副教授

来源：《大学教育》，2018年11月

“双一流”高校要重视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 ——基于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管理模式的分析

摘要：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教育的国家之一，研究型大学建立各类跨学科学术组织形式丰富多样，从目标维度可分为服务国家战略、面向未来发展和满足产业需求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跨学科学术组织虽然管理模式各异但具有一些共同特征。本文在对美国科学技术中心的管理模式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其整体呈现出组织结构扁平化、资源配置稳定化、考核评估周期化和交流共享制度化等特征，这对于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创新学科组织形式，加强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和管理，促进跨学科研究和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跨学科；学术组织；管理模式

一、引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以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催生了诸如“新工科”等一批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同时引发了高校对学科发展规律的再思考，推动了高校学科组织模式的新变革。2018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创新学科组织模式，围绕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问题组建学科，瞄准国家重大战略和学科前沿发展方向，依托科技创新平台、研究中心等，整合多学科人才团队资源，组建交叉学科，促进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作为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少“双一流”建设高校近年来着力加强了学部、交叉学科研究院、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等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建设，大力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和学科群，以适应我国新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但是，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活动仍较大程度受到传统院系组织形式及其管理机制的制约，同时也面临高等教育固有的学术标准、界定跨学科性等系列挑战。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教育的国家之一，许多研究型大学均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跨学科学术组织管理经验，可为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二、美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主要形式

美国大学跨学科教育活动最早始于20世纪初期，当时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等高校围绕跨学科的通识教育模式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开展实践。二战期间“雷达研制”“曼哈顿计划”等大规模跨学科军事研发工程

的成功实施推动了有组织跨学科研究在美国大学的开展。二战后，跨学科研究和教育开始在美国大学迅速兴起，一些研究型大学内部建立了大量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少数研究型大学甚至建立起了比较系统化的跨学科组织体系。20 世纪 80 年代后，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活动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已比较普及，并逐渐成为美国大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跨学科学术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跨学科研究院、研究中心、实验室、研究小组，以及跨学科学生培养项目等层出不穷。进入新世纪以来，跨学科发展更是上升成为美国许多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理念。例如，密歇根大学第十三任校长科尔曼女士 2002 年上任伊始便提出了“不合作就死亡”（Partner or Perish）的发展理念，并通过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安排跨学科研究经费、实行跨院系联合聘任教师、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等具体举措加以推进。斯坦福大学于 2006 年提出了“斯坦福挑战计划”（Stanford Challenge），斥资 14 亿美元资金用于支持跨学科研究。哈佛大学 2007 年专门成立了“哈佛科学与工程委员会”（HUSEC）指导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活动，同时设立了学科交叉种子基金（HSFIS），按年度资助跨学科研究和教学活动。

分类是对现存事实的一种归类，当事物演化到一个相当复杂而且比较成熟的阶段时，需要归类使复杂事物在认识上变得简便。为了更好地认识美国大学各类跨学科学术组织，分析其管理和运行模式，需要对其进行分类。诚然，分类选取的维度不同得到的结果自然迥异。比如，从组织自身的存在形式可以分为实体、虚体以及虚实结合三种，实体跨学科学术组织包括各种国家实验室、中心等，虚体跨学科组织如各种跨学科委员会或研究团队、小组等，虚实结合跨学科学术组织包括各种研究族、集群等。从组织自身的主要目标又可以分为服务国家战略、面向未来发展和满足产业需求三种类型，其中：服务国家战略型跨学科学术组织主要是指由研究型大学代管的国家实验室。二战结束后，一些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国家实验室被研究型大学代管，使得这些国家实验室具有“大学身份”。作为开展跨学科研究进行科技创新的平台，研究型大学代管的国家实验室，以“国有民营”（GOCO）的运作模式，即政府所有，大学代管的契约管理制度，有效凝聚和整合了美国大学、政府和产业界的科技资源，显著提升了美国的科技竞争力。面向未来发展型跨学科学术组织主要包括大学设立各类跨学科中心、跨学科实验室、跨学科计划或课题等。美国大学在院系内部或者学校层面成立的跨学科学术组织，为的是开展传统院系不能开展的、问题解决导向的项目研究，这类研究具有不确定性，往往会面临失败的风险。这类组织的设立和撤销都是由大学根据相关程序和制度来完成，大学拥有设立和撤销的自主权；而对于研究内容，大学自设的跨学科研究组织拥有自主权，可以自主选择合作对象和研究内容。满足产业需求型跨学科学术组织主要是指依托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各种工程研究中心、科学

技术中心、材料中心、纳米科学工程中心、认知科学中心等。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不断调整自身对科技创新活动的介入方式和介入程度，有计划地在大学内投资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大学与产业合作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如大学—产业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与科学技术中心等，这些中心统称为满足产业需求型跨学科学术组织。美国大学与产业界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有利于提高美国工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按照目标对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进行分类考察，有益于更好地认识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管理和运行模式。

进一步考察后发现，虽然以上三种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不尽相同，但其均建有十分完整的、制度化的管理体系，总体上具有组织结构机制简明、资源配置机制高效、考核评估机制健全、交流共享机制完善等共同特征。下面具体以第三类组织中的科学技术中心（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STC）为例，详细分析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管理模式。

三、美国科学技术中心的管理模式

1987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响应当时里根政府号召启动实施了 STC 项目，主要聚焦能源环境、生命健康、地球科学等交叉学科领域，旨在通过跨学科研究和不同主体的协同合作完成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知识转移三大目标。经过 NSF 精心遴选，1989 年首批批准成立的科学技术中心共有 11 个，全部依托研究型大学建立，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粒子天体物理学中心、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高温超导中心、俄克拉荷马大学风暴预报分析中心等。实践证明，NSF 组织实施的 STC 项目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跨学科人才培养和知识转移转化等三个方面均产生了显著影响，STC 概念已经非常有效地催化和培育跨学科与变革的科学技术，形成了以 STC 支持模式为特色的、解决重要科学技术难题的机制。而 STC 项目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与 NSF 对 STC 卓有成效的管理是分不开的，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组织结构扁平化

不同于传统的“大学—学院—系”科层化组织设置，STC 虽依托研究型大学建设，但一般由大学主管研究的副校长直接管理，下设中心主任具体负责运行。部分科学技术中心除了设置中心主任外，还设置了联合主任，在中心主任和联合主任下设副主任，分管各个研发项目的具体运作。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牵头，哈佛大学等参与建设的智能科学技术中心为例，中心主任直接对 MIT 学术副校长负责，在管理团队和外部咨询委员会的协助下开展工作。中心下设 2 个副主任、1 位中心经理、1 位管理主任，分别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教师担任，中心经理下设有 4 位分别负责研究、教育、知识转移和多元化事务的协调员，其中研究协调员具体负责协调智能演化、智能循环、视觉智能、社会智能、智能理论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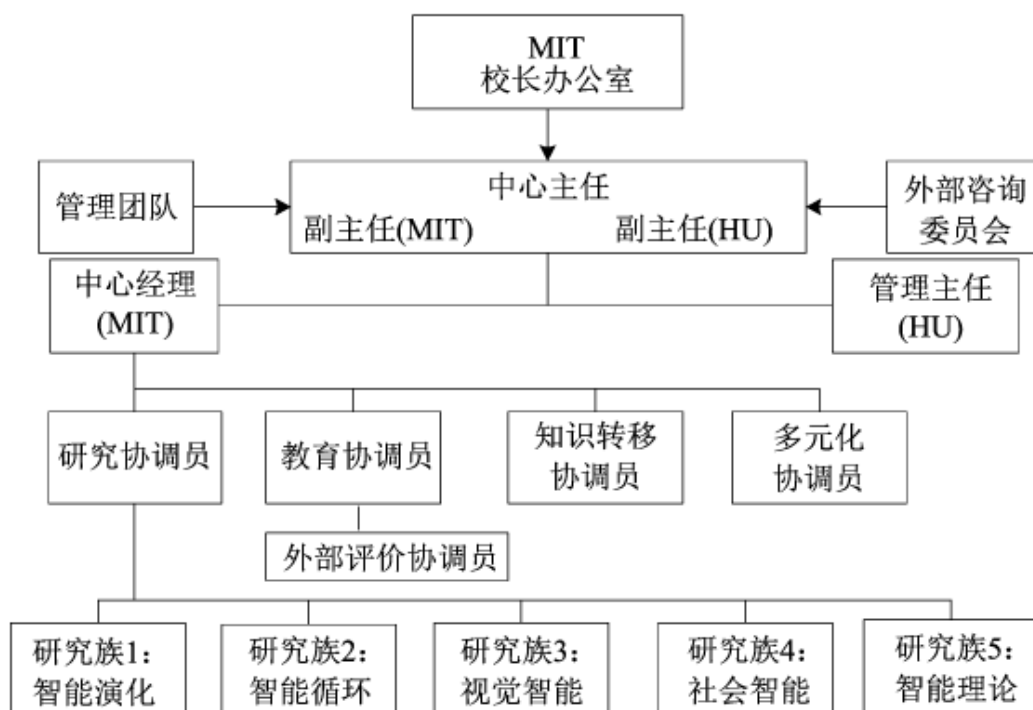


图 1 MIT 智能科学技术中心组织结构图

个研究族群（如图 1 所示）。这一组织结构设计不仅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保证了用人政策的灵活性。除了核心管理层为专职外，其余人员以兼职为主，实行聘用制，聘期为 5 年左右，与 STC 建设周期基本一致，这类组织一旦完成既定研究任务或者中期评价时被淘汰，相关人员就地解散，回到原有单位。

（二）资源配置稳定化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 STC 的支持是长期且稳定的，每个获得立项资助的科学技术中心在第一个五年内可一直获得 NSF 的资助，第四年的评价至关重要，评价结果直接决定下一个五年能否继续获得 NSF 的稳定资助。目前 NSF 每年对仍运行 STC 的资助总金额基本保持在 6 亿美元左右，每个科学技术中心每年的资助强度一般在 500—700 万美元之间。截至目前，NSF 共支持 9 批 54 个科学技术中心，累计资助金额超过 130 亿美元，其中已完成资助 40 个，淘汰 2 个，仍在资助的科学技术中心 12 个（具体名单见表 1）。除了 NSF 对科学技术中心的投入之外，科学技术中心的建设还吸引和带动了美国其他政府机构、企业、大学和联邦州政府的资金投入。据美国此前的一项研究表明，NSF 对科学技术中心的投入只占到 STC 年度总预算的 30% 左右。

（三）考核评估周期化

经过层层筛选后获得立项资助的 STC 必须和 NSF 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对双方的责任和义务、NSF 对 STC 的管理、STC 自身管理运作、成本费用等方面作了全面详尽的规定。NSF 项目官员定期对 STC 合作协议履行情况进行年度考核评

价，当发现 STC 未能遵守合作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有科研不端行为、未按要求披露信息且没有采取补救措施等情况发生时，NSF 就会对 STC 采取暂停、终止或除名等措施。此外，NSF 还会对 STC 进行年度评价，要求各 STC 主任在该预算年度结束 90 天之前提交一份详尽的年度报告，作为绩效评估和决定继续资助等级的基础，并且在 STC 结束时提供最终报告和面向大众的成果报告。年度实地考察形式包括现场考察、逆向实地考察或者虚拟实地考察，考察结果直接影响 STC 下年度的资助力度。如果一个正在运行的 STC 没有通过 NSF 的评审，那么它就会被淘汰，也不再给予经费支持。例如，1989 年建立的高级粘合材料、高性能聚合物、光致电荷转移 3 个中心以及 2000 年建立的行为神经科学中心因未通过第四年评价而止步于第一阶段，这些中心资助总额平均在 700 万美元左右，远低于正常运行中心两千多万美元的平均资助水平。

年度	学科领域	中心名称	资助期限	已资助金额
2010	生物	行为进化研究中心	2010—2021	\$43, 035, 209
	地球科学	生物圈暗能量调查中心	2010—2021	\$42, 474, 312
	工程学	节能电子科学技术中心	2010-2020	\$42, 679, 948
		集成蜂窝系统应急行为中心	2010—2020	\$42, 825, 512
	计算机、信息科学与工程	信息科学中心	2010—2019	\$43, 801, 079
2013	生物	生物学与 X 射线激光器中心	2013-2023	\$30, 413, 810
	数学、物理学	集成量子材料中心	2013—2024	\$25, 895, 862
	计算机、信息科学与工程	智能科学技术中心	2013—2023	\$30, 359, 625
2016	化学、生物学	波束中心	2016-2021	\$10, 659, 636
	生物、物理、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	细胞建设中心	2016—2022	\$11, 250, 000
	生物、机械工程	II 程生物力学中心	2016—2021	\$11, 052, 604
	材料、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和机械工程	实时功能成像科学技术中心	2016-2021	\$11, 386, 868

表 1 目前仍运行 STC 接受 NSF 资助情况一览表

(四) 交流共享制度化

完成 STCH 大目标任务往往需要跨学科团队协作，高校、企业研究人员经常需要不定期集中在一起讨论各自的研究进展，往往还需要合作建造或者使用大型仪器设备、基础设施等。为了促进各科学技术中心间的交流与共享，NSF 建立了三个层面的交流沟通机制：一是 STC 项目官员与 STC 的交流。STC 项目官员主要

负责传达 NSF 的要求和指示，解决 STC 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二是 NSF 建有 STC 主任委员会。它是一种解决超出单个中心能力范围的问题机制，旨在促进中心之间经验的分享和人才、资源的交流；策划联合行动、研讨会以及论坛；开发和分享最佳实践等。三是建有外部咨询委员会制度。NSF 要求每个 STC 都必须组建、维持和召开年度外部咨询委员会会议，加强 STC 与外部环境的交流，使其为 STC 的活动提供战略引导和管理上的建议。NSF 对落实外部咨询委员会制度是不遗余力的，比如 STC 外部咨询委员会成员须从学术机构、企业、当地机构和国家实验室中选出并由 NSF 任命的，而且规定 STC 的发展战略会议必须要有外部咨询委员会成员参与。

四、启示与思考

近年来，在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大学中各类跨学科学术组织日渐蓬勃发展，但是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相比，无论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还是组织的实体化程度、管理和运行模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我们可在借鉴美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管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大学实际的管理模式，促进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健康快速发展，不断提升我国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跨学科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能力。

（一）科学谋划新兴交叉学科布局

当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在科技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呈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并且日益处于主导地位。从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创新与学科关系来看，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原创性成果大都是学科前沿和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如果只在传统学科方向或者单一学科内研究，将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技术原创成果。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在近 100 年的 300 多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有近半内容是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学科交叉融合是学科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对学科发展的新需求，以及新时代培养复合型人才迫切需要。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制度正在日益完善，逐步走向成熟，各类跨学科学术组织形式多样。而我国大学目前最主要的学科交叉组织形式是学科交叉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类型比较单一。国家“双一流”建设赋予相关高校自主确定学科建设口径和范围的自主权，目的就是鼓励学科的交叉融合，产生和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高校要用好这个自主权，及时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自身特点和学科优势，统筹规划学科布局，自主发展新兴交叉学科，率先建成一批一流学科，引领和带动学校学科水平的整体提升。

（二）大力创新高校学科组织形式

学科作为一种学术组织建制，它是大学产生的基础，大学里首先有了学科，然后再有专业，有系和学院。尽管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学和学院里，学科框

架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自 20 世纪以来，通过跨学科的方式来解决高等教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一直备受各方的关注，政府和大学均日益重视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建设。美国政府在推动大学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以国家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信息技术中心、科学技术中心、材料中心、学习科学中心等为代表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快速蓬勃发展。以 MIT、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为代表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更是不甘落后，一方面积极承建政府委托的国家实验室、科学技术中心等跨学科学术组织，另一方面积极组建研究院、研究中心、实验室等各类跨学科、跨院系的学术组织。据不完全统计，MIT 目前建有各类跨学科学术组织 60 余个。今天，我国许多大学的学科建设仍在沿着 19 世纪以来学科制度化的轨迹在运行，这种以学科制度化为基础，以院系为中心，以学科分化为目标，以本学科教师为建设者的学科管理模式亟需改变。“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要有学科开放、科际整合的新思维、新方略，遵从学科高度分化综合规律，打破学科界限，突破院系壁垒，积极培育各类跨学科学术组织，鼓励师生从事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活动，大力促进跨学科知识的生产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三）全力支持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

2004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共同发表的《促进跨学科研究》(《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研究报告指出：“跨学科研究与教育是受复杂问题的解决需求驱动而产生的，这种复杂性问题可能来自于科学好奇心，也可能来自于社会。”美国学者克莱恩认为，“促使高校转向交叉学科研究和教育的主要力量不是知识，而是政治和财政”对跨学科的当代需求与基于学科知识范畴和院系结构的高等教育组织体系会产生冲突，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发展更需要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首先，政府要在政策资金上引导和鼓励大学建立跨学科学术组织，支持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活动，如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可借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做法，大力支持前沿科学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等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建设，并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其次，大学要加强跨学科学术组织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创新学科组织结构、队伍聘任模式和绩效评价方式，赋予跨学科学术组织人、财、物相应的自主权，创造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教育的良好氛围。最后，企业和社会各界要积极参与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建设，从人员、场地、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并在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收益等方面与大学实行共享。

（四）有效保障跨学科学术组织运行

由于协作过程要求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共同参与，美国高等教育的跨学科尝试都有一系列的发展策略、组织结构、配套政策与最终目标。以 STC 为例，在政府层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门制订了发展战略，并成立了综合活动办公

室 (Office of Integrative Activities, OIA) 具体负责科学技术中心的启动、立项、资助、评估和终止, 以及相关的监督和协调工作, 在管理过程中还注意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委员会的监督和咨询作用, 以确保 STC 项目的成功; 在大学层面, STC 牵头高校一般都建立了由主管副校长及教务长负责的管理机构和相关的咨询机构, 对处于建设周期的 STC 提供全方位的指导监督和咨询服务, 以及在人员、场地和设备共享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以确保 STC 任务的达成。目前, 我国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高校层面, 对于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管理和运行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很多跨学科学术组织还处于一种自发状态。政府和大学需要进一步明晰促进跨学科研究和教育的发展战略, 成立跨学科学术研究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等咨询机构, 就跨学科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进行研究, 出台支持跨学科发展的配套政策, 促进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健康和有序发展。

作者: 朱永东, 华南理工大学发展战略与规划处

来源: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8 年 12 月

“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摘要：针对我国目前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数量偏少、水平偏低，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需要的现实情况，国务院于 2015 提出“双一流”建设方案。《方案》的提出，既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也为地方高校带来机遇和挑战。“建设一流师资队伍”作为“双一流”建设任务之意义重大。地方高校应该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结合本校自身战略布局，合理规划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现实意义；挑战；机遇；应对之策

2015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的提出，其目的是“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使高校“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根据《方案》，“到 2020 年，我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 2030 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 21 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国家全面崛起的现实要求。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尖端科学研究、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但是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摇篮，而且是现代人类文化、思想的重要源泉。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宗本教授认为：“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软实力的竞争，是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的竞争，而大学的责任，就是为国家富强和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培养出符合需要的创新者、劳动者和推动者。”

一、“双一流”建设提出的现实意义

“双一流”建设的提出，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现状反思后做出的重大决策。目前，我国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数量过少、水平偏低，尚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需要。

从一组 2016 年年底测算的国际四大排名综合排名情况来看，我国进入世界 200 强的高校仅有 7 所，最好排名为第 44 位。

从美国 Clarivate Analytics 公司（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公布的 2018 年 1 月中国内地高校 ESI 综合排名前 100 名的情况来看，虽然通过

“双一流”建设，一些高校或多或少地取得进步，但进入世界排名前 500 位的高校仅有 24 所，最好排名为第 107 位，建设任务仍旧任重道远(见表 1)。

国内排名	学校名称	2018 年 1 月国际排名	2017 年 11 月国际排名	增长	学科数
1	北京大学	107	112	5	2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110	114	4	17
3	清华大学	126	128	2	17
4	浙江大学	128	130	2	18
5	上海交通大学	144	149	5	17
6	复旦大学	178	181	3	17
7	南京大学	226	228	2	16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27	229	2	12
9	中山大学	232	234	2	18
10	山东大学	304	311	7	15
11	华中科技大学	317	324	7	15
12	四川大学	324	331	7	15
13	吉林大学	338	342	4	11
14	武汉大学	385	392	7	16
15	哈尔滨工业大学	393	399	6	11
16	南开大学	400	402	2	10
17	西安交通大学	419	423	4	14
18	大连理工大学	437	440	3	9
19	中南大学	443	451	8	14
20	北京协和医学院	444	446	2	10
21	华南理工大学	446	449	3	9
22	苏州大学	473	484	11	9
23	厦门大学	485	487	2	12
24	同济大学	499	508	9	11

表 1 2018 年 1 月中国内地高校 ESI 综合排名 TOP

说明：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 ESI）是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ESI 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其数据库以学科分门别类（共分 22 个学科），采集面覆盖全球几万乃至十几万家不同研究单位的学科。

“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意义在于是要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地位相称的世界级大学。国家是要通过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使我国成为国际学术中心，而不是仅使几所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二、人才队伍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所在

一流的学科和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人才，如果没有高水平的人才队伍，高质量的人才培养、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高效率的社会服务和高内涵的文化遗产创新就无从谈起。因此，人才队伍建设是推进的关键所在。

《方案》中把“建设一流师资队伍”放在建设任务首位，这是因为：首先，人才队伍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大学的基本职能，而人才队伍无疑承担着这些主体任务，付出创新性劳动。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有通过引进和培养，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双一流”建设才有根基。其次，一流的人才是一流大学的建设的内涵所在。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皆具有以下特点：雄厚的办学实力，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培养出“名垂青史”的知名人物，拥有在相关领域对科技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教授。因此，是否拥有一支一流的人才队伍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指标。最后，一流人才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必要支撑。学科建设是龙头，是高校核心竞争力。学科建设强调三位一体，即“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不难发现，人才队伍是科技创新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一流大学的建设需要一流学科的支撑，一流学科的建设又需要一流人才和成果的支撑，这些要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以某校人才工作为例：某校从 2007 年启动“人才强校”战略以来，引进各类人才 1400 余名，由此带来学科建设的飞速发展。

指标	2007 年	2018 年
全球 ESI 前 1%学科数量	1	9
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	6/24	28/51
国家重点学科	2	4
江苏省优势学科	—	21
博士后流动站	12	29

表 2 某校学科建设情况

说明：数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8 月

该校在国际四大排名中的位置节节攀升，见表三。

排行榜	2007	2015	2018
《THE 世界大学排名》大陆/亚洲高校	—	17/—	15/72
《QS 亚洲大学排行榜》大陆/亚洲高校	—	43/181-190	38/163
《U. 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大陆/世界高校	—	32/511	26/479
上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大陆/ 世界高校	—	28-32/ 401-500	10-18/ 201-300

表 3 某校在国际四大排名榜上的提升情况

三、“双一流”建设为地方高校人才队伍发展带来新机遇

广义的地方高校是与“中央部属高校”相对，隶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特区，由地方行政部门划拨经费的普通高校，分为省属国家“211”重点大学、省部共建大学、地方性直属高校等三大模式。本文所论的即为此意义上的地方高校，它们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

《方案》开篇，即提到：多年来，通过“211 工程”“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取得重大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大大提升。同时，重点建设也暴露出“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双一流”建设提出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平竞争”“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持”。“双一流”建设所坚持的问题导向，打破身份壁垒，鼓励公平竞争，这为地方高校实现跨越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打破身份壁垒，冲破等级束缚，为地方高校跨越发展提供可行性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划分为“985”“211”或者部属高校、地方高校等。这种固化的身份秩序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思路的体现，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归根结底还是资源配置和平均分类问题。国家将主要财力投向少数重

点高校，而地方高校则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同时，这种身份标签也影响大众对地方高校的认知与评价，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和发展等方面“矮人一等”。这种身份标签严重制约地方高校主体积极性的发挥，从而影响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活力。“双一流”建设摆脱了等级束缚，而是强调统筹推进，这样更易于地方高校获取资源，得到更为客观的评价。“双一流”建设从宏观政策层面，鼓励和要求地方高校在相应领域追求卓越。

（二）鼓励公平竞争，为地方高校跨越发展创造选择性

《方案》提出，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虽然从目前来看，地方高校在竞争中还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但此次“双一流”建设不再是资源配置“终身制”，而是以绩效为杠杆，这就让地方高校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由于有了动态调整机制，地方高校只要自身建设实施有力、成效明显，就能持续不断地获取发展资源。为了提高地方高校积极性“双一流”建设还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地方高校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相关资金给予引导支持”。这些举措说明国家已经把建设一流的目光从原来的少数重点高校投向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地方高校建设一流将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三）避免恶性竞争，为地方高校跨越发展带来多样性

过去，高校学科、专业重复交叉的问题既造成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也造成资源投入的低效和浪费。在这种竞争中，地方高校由于资源的相对匮乏，即使参与角逐，也通常难以为继，甚至在竞争中反而丧失了自身特色与优势。比如，金融、电子信息等应用型学科随着社会需求增大，专业持续走俏，它们成为高校建设的重要领域。这本是一些地方高校的优势和特色，但少数重点大学由于名气大、经费支持多、吸纳人才能力强，反而占了上风，地方高校只能屈居其后。而“双一流”建设强调加强战略规划和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鼓励和支持学科差别化发展，这让地方高校不仅能够免于恶性竞争，还有可能获得创优创特的资源和支持。

四、“双一流”建设为地方高校人才队伍发展带来新挑战

《方案》已经落地，地方高校在面临前所未有机遇的同时，也不得不正视挑战。

（一）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生态环境

如果说前几年，人才队伍还只是少数学校关注的重点的话，那么现如今，从地方到行业，再到科研院所、各类高校，对人才的需求和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地方高校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发展空间受到国外高水平大学、国内一流大学的共同挤压，而学校面临的政策、平台制约学校继续争先进位。

（二）既有的发展不平等是需要尽快跨越的鸿沟

在国家实行的“985”“211”发展环境下，无论在显性的制度设计，如招生、财政拨款、评价等，还是隐性的考评机制，如学位点评审、学科评估等，都在维护、强化高校“身份”效应，即有了“身份”，意味着“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话语权和更强的资源获得力”，这使得地方高校与部属（重点）高校的发展环境不对称，机会不对等，资源获得能力远低于部属高校。经费资源投入少、师生资源质量低、政策资源支持弱是过去压在地方高校身上的“三座大山”。

“三座大山”带来的消极影响很难在短时间内根除，如何抓住机遇，突出重围，尽快跨越既有的发展不平等造成的鸿沟，是需要地方高校审慎思考的重要课题。

五、地方高校的应对之策

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亦步亦趋显然不足以支撑地方高校的跨越式发展。如何制定一条适合本校自身发展情况的“人才强校”战略，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才是题中应有之义。本文重要从微观层面，提出地方高校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人才队伍建设的方面一些建议。

（一）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人才观

人才是第一资源。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在国家“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地方高校应该明确“人才强校”战略，紧密围绕优势学科和新兴学科，以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为载体，坚持“有选择引进、有计划培养”的方针，继承和发扬已有的先进做法，以打造高水平人才队伍为目标，不断创新人才工作机制，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和谐环境，为学校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才队伍保障。

（二）有选择引进，打造适合学校发展战略的人才队伍

人才队伍建设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和路径，各地方高校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学校发展定位等制定自身的发展规划。对于那些已经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地方高校而言，应该逐步完成从求“量”到重“质”的转变，精准引才，重点引进与学科发展高度关联的高层次学术领军人才和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青年学者，努力构建由若干跻身于世界学术高峰的学术大师、一批活跃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的领军专家、一大批活跃在国际学术最前沿的青年才俊组成的师资人才金字塔。只有这样，才能在“双一流”建设中求得一片天地。

在人才引进的过程中，地方高校应转变思路，“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用“主动出击”来化解“知名度低”的劣势。例如，在国际知名新闻媒介上发布招聘广告；积极鼓励学院（部）、教授通过国际高端学术会议平台，发布人才需求信息，宣传学校人才引进政策；充分发挥讲座教授、客座教授、海外知名校友等延揽人才作用，招募优秀人才，以此扩大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国际

知名度和影响力；还可以鼓励全校师生参与学校引才工作，设立“伯乐”奖励机制等。

（三）有计划培养，完善师资队伍培养体系

在“引进来”的同时，如何用好现有人才也是人才队伍建设重点之一。“重引进、轻培养”“招来女婿，气走儿子”是一些高校发展中被人垢病的主要地方。对于地方高校而言，现有师资已有一定规模，如何盘活“家里的存量”使现有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与引进人才迅速融合，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引进人才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改善人才队伍供给状况，但要满足“双一流”建设对人才急剧增长的需求，根本在于增强人才的自主供给。地方高校可以针对自身特点，制订校内培养计划，努力打造教师成长平台和体系，建设“人才金字塔”，填补国家人才成长阶梯“缺阶”。

（四）建章立制，完善师资队伍建设管理机制

规范人才队伍建设各项工作，是地方高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保障。以提高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为一项工作的出发点，尊重学科差异，完善分类管理与评价机制，不断尝试最有利于人才队伍建设的方法、制度，形成有效机制，以文件、管理办法等形式确定下来，用以指导进一步工作。

学校可以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人才引进工作各项事宜，对于人才工作中的特殊情况、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等及时决策、处理。

可以尝试建立师资队伍建设目标责任考核制度，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学院（部）在人才队伍的引进和培养计划与目标，建立奖惩机制。

建立健全学校和学院（部）领导联系教师制度，将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教师发展有机结合。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尝试“院为实体”的综合改革，落实学院（部）在人员管理、经费预算、资源配置方面的主体地位，做到资源投入与事权责任相匹配、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相协调，提高学院（部）在人才工作中的积极性。

（五）用“速度”延揽人才，用“情怀”感染人才

如前所述，地方高校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仍处于劣势地位，那么在日益激烈的“人才战”中如何“异军突起”？这就要求地方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中应该形成自己的“特色”。

首先，以效率促成绩，完善教师引进与聘用的应答机制，用快速、便捷的工作流程延揽人才来校工作。

其次，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学校对教师的人文关怀，营造“让奉献者有荣誉、让付出者有收获、让干事者有平台、让努力者有盼头”的多元开放、包容并蓄的文化氛围，增强教师的获得感、自豪感。

最后，人事部门作为人才工作的核心部门，应该树立“放、管、服”的工作理念。“放”是学校对于人才引进（聘用）充分放权学院“院为主体”，激发学院招才引人能动性“管”是学校从宏观而非微观方面进行管理；“服”是从待遇、配偶工作、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科研平台等方面关心、关注各类人才。

综上所述“双一流”建设给地方高校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地方高校应该牢牢把握机遇，积极面对挑战，通过夯实人才队伍建设，把学校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作者：杨凝晖，苏州大学

来源：《继续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

主办：西安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

主编：谢立仁 徐光明

地址：未央校区行政楼 516 室

电话：029-86173173

印刷份数：120 份

责任编辑：张楠 王卓璐

邮箱：gjstg@xatu.edu.cn

传真：029-86173173

特别说明：本刊为内部交流专刊，所载文稿仅供学校决策层、教育研究者参阅，所言所述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引用，若引起纠纷，本刊不负任何责任。真诚欢迎全校教职员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调整栏目内容，更好地服务大家。